

出版者說明

埃爾·白勞德是美國共產黨的叛徒，修正主義者，一九三〇至一九四四年曾任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美國共產黨中以他為代表的一部分修正主義者公然鼓吹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認為在當時的美國應當實現“階級調和”，取消階級鬥爭，並且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主持解散了美國共產黨。白勞德的錯誤路線遭到了以福斯特為首的一部分美國共產黨員的反對，白勞德後來也被驅逐出黨。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為祝賀恢復美國共產黨給福斯特同志的電報中曾經指出：“白勞德的整個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這條路線充分表現於白勞德所著《德黑蘭》一書中），本質上是反映了美國反動資本集團在美國工人運動中的影響。”

《德黑蘭》一書寫於一九四四年。白勞德在這裡認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月間美英蘇三國領導人的德黑蘭會議，“對世界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方位指標”。“‘德黑蘭’代表着在那裡開會的領袖之間、他們的政府之間、他們所代表的統治階級之間，以及世界各國人民之間堅固的和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這樣它就保證了締造一個持久和平的“新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和平共處，共存共榮。亞、非、拉美的殖民地問題不要通過鬥爭，只要通過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之間

的国际合作和經濟協議就可以求得解决。

至于美国国内問題，他以为应当“永远是絕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即以壟断資本家的国家的利益为基础。这就要求共产主义者“忍耐”，“学会如何使許多互相冲突的观点和利益在妥协的基础上靠攏起来”，要放棄社会主义的前景，不然就会“把明智的資本家赶回他們最反动的伙伴的怀抱中去，使美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集团紧密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进步”。白劳德认为，把上面这些主張归結到实际行动中，就是要解散共产党。“共产主义者預見到，他們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內，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因此，我們的政治行动将溶合在这种更大的运动之中。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独立政党的存在再不适合实际的目的了，反而会成为达到更大团結的障碍”。

从《德黑兰》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白劳德的基本的修正主义言論并未脫出伯恩施坦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窠臼，而現代修正主义者的許多論点，又往往同白劳德之流的观点如出一轍，所以《德黑兰》这一反面教材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編 一个新的世界	4
第一章 德黑兰勾銷了慕尼黑	4
第二章 武力为政策服务	10
第三章 德黑兰的保证	14
第二編 战争决定着战后的世界	22
第四章 英苏美联盟	22
第五章 欧洲的复兴	31
第六章 亚洲的民族解放	39
第七章 非洲和近东	46
第八章 在美洲的好邻居	50
第三編 战后的全国团结	58
第九章 战时的团结要求战后的团结	58
第十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	63
第十一章 经济计划的纲领	68
第十二章 全国团结中的工会	78
第十三章 民主和全国团结	86
第四編 1944年的选举——赞成团结还是赞成分裂?	102
第十四章 党派斗争是昂贵的奢侈品	102
第十五章 我们应当反对谁?	107
第十六章 共产主义组织的改变	113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的贡献	118

历史以飞行的速度在前进。自本书于三月終写毕，到付印前，在若干重要方面事情又已經有了新的变化。我决定不作最后一分钟的修正，来使本书及时。就让它像原来所写的那样，当作今天历史发展速度的证明吧，因为它到达大多数讀者手中以前，許多变化还会发生。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写作当时的个别事实的記載，而在于它处理迅速变化过程中的事实的态度和方法。变化的本身，及其日益加速的步伐，乃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事实。

我們可以略为提到在四月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僵局已經打开，成立了以体现六党联盟的“解放委员会”为基础的新內閣，这样就最后实现了去年十月莫斯科外长會議所定的目标。在中国，由于孙科博士公开要求着手使重庆政府民主化，长期酝酿的内部危机在国民党最高統治集团間已經公开化。在墨西哥，暗杀卡馬卓总统的企图幸已挫敗，这种企图像閃电一般暴露了希特勒通过阿根廷和玻利維亚的法西斯独裁向西半球进攻的威胁，而墨西哥反革命的辛那基运动就是这种法西斯独裁的一个分支。在国际劳工局的費城會議中，根据維森特·倫巴多·托列达諾和一个联合的拉丁美洲工人代表团的提議所作的，把作为法西斯主义代表的一个阿根廷“劳工”代表开除的决定，乃是支持国务卿赫尔的政策的生動表現；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罗伯特·瓦特对于这个提案的反对，却可耻地暴露了劳联领导的破产，它随时可以为了狭隘的、局部的和反动的考虑来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胡佛和塔夫脫所操纵的机

器表明了它对党的预选会的控制以后，威尔基先生已退出总统竞选，这样就使选举运动中所有的问题不但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全部变得尖锐化起来——而且出人意外地使威尔基先生处于更加有力的地位，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如果他有意这样作，而不恋恋于个人的当前腾达的话。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发展，均足以证实本书的主要论点。我的期望是，事变的进程将会继续提供这样的证明。期望中最重要的一项，自然是等待已久的开辟反对希特勒的西方战线，这在本书普遍流传之前，必然已在进行了。

极度紧张的日子，巨大的事变，以及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们的智能加上了一种沉重的负担。长久以来似乎能对许多人提供充分的指导去应付生活中的问题的陈旧偏见，现在已经表明它们是不够的，是只会造成混乱的。旧的指路标已经倒下去了，或者已经歪曲了，朝所有的方向乱指一气。老的地图已经发现不再符合实际。世界正在惊涛骇浪中航行，而单凭经验得来的航行技术帮助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无用的话。人类必须找到某种固定的明星，来指引自己的进程。

德黑兰会议对世界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方位指标。本书系对我们的若干最迫切的问题加以考察，根据德黑兰的前景对它们重新估价。

我以前的那本书，1942年10月刊行的《胜利和胜利以后》，只对战后的世界问题略加窥测。本书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面，因为它们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已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看到，只在我们能够开始绘出胜利将要带给我们的那个世界的面貌时，美国才能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战争，早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世界正在雷霆万钧的暴力锤炼中形成。由于对希特勒的兴

起未能及时制止，这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主义是树立以暴力为最高生活准则的一种企图；只有用更大的暴力去对付它，才能将它消灭。但在希特勒主义被从地球上清除了的时候，各种更为深刻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力量就会作为直接的决定性因素，重新处于显著的地位，甚至当它们还是军事斗争本身的决定性背景时，就已经是这样。这就是为征服自然、为解决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问题而斗争的地球上各国人民的力量。暴力，以及暴力的工具，并不像希特勒所梦想的那样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则就不能合理地解释由铁托元帅率领的强大的南斯拉夫解放军从一个被解除了武装和被粉碎了的国家中的兴起，他们赤手空拳，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用来击败敌人。我们也无法了解伟大的中国解放运动、八路军的兴起，和使用从日本人夺来的武器、担负对日作战一大部分责任的游击队。

是的，在人类事务中的确有一种潮流。这就是民主的潮流，是人类负责处理它自己的事务的潮流，这种潮流把那些藐小的、装模作样的自大狂人和特权阶级的种种借口抛到了一边，这些人认为自己有神圣的权利通过暴力和破坏活动来把人类当成一群乳牛和役畜那样统治。

本书即是帮助扩大这种历史的民主潮流的一种苦心之作。

虽然本书的形式和内容，特别是其中可能包含的任何错误，必须由我个人负责，但从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来说，本书并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而是在美国和全世界中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产物，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对于苦心想出书中各种看法的千千万万个未列名的贡献者，我必须表示感谢。最后我还必须提到，我的妻子雷莎·白劳德为本书出版分担的劳苦不是我用言语所能形容的，于此我只有表示我的爱情和感激。

埃尔·白劳德 1944年4月27日

第一編 一个新的世界

第一章 德黑兰勾銷了慕尼黑

1943年11月末和12月初，領導聯合國家的英蘇美聯盟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三大強國的領袖們，同他們的軍事參謀人員和外交人員一道，研究了戰爭時期的世界問題。他們得出了共同的結論，這體現在一個聯合宣言中。

德黑蘭宣言明明白白地代表着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轉折點之一。

德黑蘭政策(如果把它看作表裏一致的話)確實地、永遠地勾銷了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的政策，在那次會議上，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达拉第把歐洲斷送給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們訂立條約，使世界陷入今天的水深火熱之中。

“德黑蘭”的政策同慕尼黑相反，它在軍事上保證從歐洲消滅希特勒主義，在政治上保證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持久的和平，它將為未來的世世代代消除戰爭禍患。因此，我們對所有一切國內問題和世界問題的答案，全視我們對於“德黑蘭”的判斷如何為轉移。

“德黑蘭”僅僅是無止無休的國際會議的又一次嗎？德黑蘭宣言僅僅是又一個外交文件，記載着無法調和地互相敵對着的列強間一種暫時性的妥協嗎？抑或從冷峻的現實來說，“德黑蘭”如同它所意味着的一樣，是簽字的三大強國所共同懷抱的**根本的**長期的政策，這種政策將為子孫後代締造一個新的世界呢？

这是每一个美国人必须自己首先作出答复、然后他对公共生活中其他任何問題才能作出理智的判断的根本問題。

本书从头至尾是对德黑兰協議以及从而产生的后果的一种評价。

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引述德黑兰宣言的全部原文。我知道大多数美国讀者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即跳过有关公文书的长篇引文，特別当这些引文出现在书的开头时；他們认为自己已經熟习这些了，想看点新东西。所以我必須首先警告讀者：絕大多數的人只看过这个宣言一次，或者全未看过，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草率从事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来討論“德黑兰”的。

因此我严肃地請求本书讀者在这个时候来讀德黑兰宣言，并且要重讀几遍。如果不这样作，那末繼續花在本书其余部分上的時間大半都将成为浪費。

宣言全文如次：^①

“我們——美利堅合众国总統、大不列顛首相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过去这四天中，已在我們盟邦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集会，已經拟定并且认可了我們的共同政策。

“我們表示我們的决心：我們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們的軍事參謀曾参加我們的圓桌討論，我們已經拟定了关于将德軍消灭的計劃。我們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軍事行动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協議。我們在这里达到的共同默契保证胜利一定是

① 这是由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于1943年12月1日在德黑兰签字的《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的全文。譯文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第407—409頁。——譯者

我們的。^①

“关于和平方面——我們确信：我們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认我們以及所有联合国負有至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許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和我們的外交顧問在一起，我們曾檢討了将来的諸問題。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們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眞忱。我們將欢迎他們，听他們抉擇，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擋我們由陆上消灭德国軍队，在海里消灭他們的潛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們的兵工厂。我們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②

“从这些友誼的會議出来，我們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殘，凭着他們多种多样的願望和他們自己的良心而生活。

“我們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們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这就是德黑兰協議。

-
- ① 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第408頁，这一句是单独列为一段的。此处仍照《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原书第12頁，把这一句列在前一段的后面，不单独成段。——譯者
- ② 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第409頁，这一句話是单独列为一段的。此处仍照《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原书第13頁，把这一句列在前一段的后面，不单独成段。——譯者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表里一致的，-然后試圖了解必然隨之而來的一切具有深遠影響的後果。或者我們可以拒絕把它看作是表里一致的，我們可以開始作出這種或那種保留，這樣作時我們也必須試圖了解具有深遠影響的相反的後果。

當我們在對待“德黑蘭”的兩種態度之間作出這個根本的抉擇時，我們不妨回憶一下，在德黑蘭會議之後幾個星期內，希特勒也對世界講了話。希特勒對“德黑蘭”的答复是怎樣的呢？

在他的新年致詞中，希特勒不再企圖否認在英蘇美聯盟的手中掌握了摧毀他和他的全部工作的力量。他拿出了他的最後一張王牌，他希望還可以用來取勝。他恫吓世界說，他的毀滅不僅會導致“一次自從民族遷徙以來最為不幸的社會崩潰，”而且會導致“一次範圍不可想像的經濟上的大災難”，當他的統治消逝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發生，不是在英國和美國之間，就是在英美兩國和蘇聯之間。

對希特勒的唯一答复，就是把它作為一個能夠實現而且一定要實現的、會帶來它的全部後果的現實行動綱領來看待的德黑蘭協議。

對於完全接受“德黑蘭”作為現在歷史時期的鎖鑰如有任何的保留，只能有一個後果，那就是為希特勒重新開門，加強他而削弱我們，延緩我們的勝利並增加取得勝利的代價，歸根到底就是重新提出勝利是否可能的整個問題。因此，絕對地擁護“德黑蘭”，把它作為一個現實的前景和行動的綱領，就是不再回到慕尼黑的唯一辦法。

必須把德黑蘭宣言看作是表里一致的。它的意義和字面完全一致，並不包含什麼另外的意思。任何想要在這個歷史性文件的直率而坦白的文字背後去尋找什麼神秘的或隱藏的含義的企

图,只能得到落入希特勒的圈套、退回慕尼黑主义老路的结果。德黑兰协议会产生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但这些后果要能够为我们所了解,就只有从这样一个毫无保留的前提出发:即“德黑兰”的文字和意义完全是一致的;它并不包含什么另外的意思;我们必须整个地接受它,我们不能只接受它的一部分而拒绝它的另一部分;任何其他的途径都是向希特勒主义投降的道路。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就对“德黑兰”所作的“右翼”保留来说才是真实的,但必然还有“左翼”的保留,这不仅是许可的,这甚至还是必须有的。

这类“左倾幼稚病”(列宁是这样称呼这种思想的)的晚近表现,比普通一般的各种保留甚至更加有害,更加危险。这些人虽然自命为最不妥协的反希特勒派,但在他们的“左倾”、“激进”甚或“革命”的画皮背后,他们却实行着希特勒演说中所提的职能。

对“德黑兰”来说,无所谓“左与右”这种分歧。只有接受或者拒绝德黑兰纲领,而所有各种形式的保留,不问作为其根据的思想动机如何,都是希特勒手中的武器。

在这种“左的”保留中,最典型的是这样开始的,譬如说,是呀,自然,我们都赞成“德黑兰”,但是宣言说到“我们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协议”,决不能认为是解决了第二战场的问题;不,不,除非我们都来比以前更加大声疾呼,根本就不会开辟第二战场!

甚至在少数共产党人中间——我谈到这个是感到最不愉快的——也表现了这种对第二战场问题的庸俗化的看法,完全体现了最腐败的报纸专栏作家的心情。我们的一个地方组织的书记在德黑兰会议之后,突然发现了有展开一个要求“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的群众运动的迫切需要,幸而,整个组织自动地拒绝

了这样一个政策，立即集会，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整个的“保留”路线。在这里看到了，“一点点保留”只是一个大动物的尾巴，这个大动物就是同完全否定“德黑兰”相等的整个保留方式。

試想在柏林的希特勒的宣傳机关将会何等高兴，如果它真正能够向欧洲广播，說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共产党人，对于德黑兰协定沒有信心——不相信它的軍事方面，不相信它的政治方面，或者不相信它的战后經濟前景!!! 但是希特勒是得不到这种快乐的。不仅共产党人，还有全国大多数人，都是相信德黑兰協議的。

“德黑兰”代表着在那里开会的領袖們之間、他們的政府之間、他們所代表的統治階級之間、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堅固的和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

希特勒狂妄地企图使全世界相信并不存在这样的共同利益，就有也并不是强固到足以消除分歧和旧有的矛盾的。柏林电台对英国和美国的一般公众說，“德黑兰”代表着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大投降；同时，它又轉向苏联、各殖民地以及劳工和中等階級中的“左”翼，狂呼斯大林为了一点点不可必得的軍事援助，向丘吉尔和罗斯福“出卖了革命”。

在英国帮助希特勒的，同样是这样一些国會議員，他們新近譴責丘吉尔“对斯大林投降”，因为“德黑兰”使得对波兰和南斯拉夫問題必須立刻采取一个新的共同的态度；还有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他們譴責斯大林“出卖革命”。

在美国帮助希特勒的，就是国会中罗斯福的恶毒反对派的領袖們，整个反苏煽动者陣营，反对英国的鼓动者們，以及所有叫喊对德黑兰協議怀疑和不信任的那些“左派分子”，包括由于宗派主义和思想上的懶惰而可能墮入这种陷阱的脱离正道的共

产党人：

“赞成还是反对德黑兰”——这就是下个时期内美国和世界政治的試金石，直到“德黑兰”的原則完全实现为止。

德黑兰協議提供了一个綱領，能够而且必須用它来团結所有各个階級中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一切往前看的男女們，把所有其他的考虑都服从于这样一个唯一的目标：結成一个坚固的和有效的人民多数，指引全国和全世界沿着“德黑兰”的道路前进。

第二章 武力为政策服务

在德黑兰，就英苏美联盟在东方、西方和南方反对希特勒德国采取軍事行动的范围和时间达成了完全的協議。这种联合行动一向被所有严肃的人們认为是胜利的唯一保证。从純粹的軍事考虑来看，这样的共同联合作战自从1942年以来就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然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代表强大国家的强大军队从“純粹的軍事考虑”来行动的事。强大的軍事力量是为服务政策而行动的。当这些军队代表一个联盟时，只在下列場合它們才能协同一致地行动：即当每一个組成联盟的强国为共同的敌人所直接攻击并且联盟制定了一个共同的政策时，所謂共同的政策就是关于共同胜利将要采取的形式性的協議，因而代表着联盟每一成員的根本利益。

从对希特勒主义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迅速的軍事决定的观点看，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已在1942年由正式的宣言承认为“迫切的需要”。但只在两年以后，这才开始实现。

全面联合战争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与其说第二战场所等待的是军事的准备，毋宁说是军事的准备在等待共同政策的制订。

关于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时间，在德黑兰已经达成完全的协议，作为关于全部世界政策的协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关于军事行动的完全协议，共同的世界政策是决不可能取得同意的；但同样，如果没有关于战后世界面貌的全盘协议的主要之点，共同的军事政策也决不能定出来。

这样一种共同的政策显然必须和三个主要强国各自单独定出的政策不同。它必须有可能容纳每一国所认为绝不可少的东西，同时规定在战略关键上采取共同行动，以便为战后的国际秩序定出一个全面的轮廓，足以吸引人类的有效多数的合作。总之，一个共同的世界政策是一种妥协。在德黑兰采取的共同政策的各个要点将在以下各章讨论。此刻我们只研究这是一种妥协这个问题，以及对共同军事行动的稳定性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在事理上，关于德黑兰的军事协议的详情细节，只在它付诸实施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在此以前，那只是最高指挥部的专有物。在政治上一般感到关切的唯一问题是：已经达成了协议，协议是有效的；除此以外，可以正确地应用“把它交给专家们”这个口号。军事协议是胜利的保证。那是在战争中、在以最强大的现代毁灭武器武装起来的大量军队的生死冲突中实施的。

有没有这种危险，即由于军队所执行的共同政策是一个如上所述的妥协政策，以致全部军事力量不能发挥出来？

依我的意见，并没有这种危险。本书整个用来说明“德黑兰”在其所有一切方面的健全，以及威胁德黑兰政策全部实现的那些危险，和怎样才能一定战胜这些危险。为了避免这些危险，

我們必須注意它們，我們不應裝作看不見它們，我們必須準備同它們鬥爭。為此，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不凭空製造出幻想中的危險，我們不把自己的力量花在跟風車搏鬥上面。

我相信英國和美國在 1944 年將從西面真正把它們的全部聯合軍事力量投入反對希特勒。我完全相信德黑蘭的全部協議必將執行。這種信仰的基礎是簡單的，可以一下子說明的。英國和美國的国家利益，從兩國的統治階級來看，要求全面執行德黑蘭協議，包括它的軍事方面。在這整個問題中，沒有必要為一種不甘願“作些事情幫助蘇聯”擔憂。戰爭的這個階段早已過去了。今天英國和美國的最高需要就是行動起來，幫助它們自己。

戰後世界的性質大半將為在戰場上贏得勝利的人們所左右；這是人世生活中的基本事實之一，沒有一種意識形態能夠限制它，也沒有其他的因素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它。

英蘇美關於戰後世界的共同政策，是完全以這種協議為基礎的：通過聯盟的全部力量的共同軍事行動，使戰爭勝利結束。蘇聯長時期以來即在使用其全部力量。英國和美國必須在 1944 年把全部力量投入戰鬥，不是因為蘇聯要求這樣作，而是因為它們自己的利益要求這樣作。

全面聯合作戰的問題對蘇聯已成為縮短戰爭的問題。對英國和美國來說，這依然是一個贏得戰爭勝利的問題。

因此，對於在今年內以全部力量投入西歐，不作片刻稽延，英國和美國也具有同蘇聯完全相同的利害關係。英美兩國有迫切的理由渴望執行德黑蘭協議，正像蘇聯一樣。實現德黑蘭協議已經變成一件毫無掩飾的、十分明顯的有關切身利益的事情，不僅對英美的人民群眾來說是这样，就是對大小資本家來說也是这样。

和“德黑兰”走不同的道路，必然使英美的賢明領袖們躊躇，不問其階級或意識形態如何。因為這是一條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區造成混亂和无政府狀態的道路；這的確是希特勒在新年致詞中所恫吓的前景。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像現在這樣組織起來的英國或美國是沒有地位的。英國和美國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求實現“德黑兰”的願望，否則就只有面臨一種或另一種方式的无情的失敗。

只有像麥考密克上校和他的朋友們那一類熱狂的、不理智的、魯莽的、不顧死活的人們才敢於公開地向“德黑兰”挑戰，並且歡迎走另外一條國際无政府狀態的路。他們敢於這樣作，因為他們在本質上是混沌的人，在心靈上是法西斯主義者，在性質上是細小的暴君並且有野心成為強大的暴君，是些藐視“人類”這個字本身的人，對他們來說，意想只不過是用來打倒他們的同伴的棍棒，這些人是這一類真正的納粹分子，他們說：“當我聽到文化這個字的時候，我就伸手摸我的槍。”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德黑兰”代表着他們的希望和企求，這是絲毫沒有疑問的。可能有疑問的，只是能否把問題盡量明確地、清楚地提到他們面前，使他們心中能夠消除那些妨礙他們理解的混亂和偏見。

必須承認，大多數美國報紙沒有設法將德黑兰綱領清楚地擺在人民面前。必須承認，麥考密克上校之流揮舞着蒙昧主義的強大武器。

必須承認，美國還未能使自己完全擺脫本國產生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

必須承認，那種認為事情一如往昔和政治一如往昔的心情和趨向正在擴展開來，削弱了美國對作戰的努力，使美國人的心

灵陷入矛盾。

所有这些留在美国为履行其根据德黑兰协议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而作出努力的道路上的问题和困难，都是能够而且一定会被解决的。美国人民身心健康，他们对诚实而勇敢的领导是一定有反应的。美国的士兵同世界上的任何士兵一般好，他们的技术领导整个说来质量很高，在行动中还会变得坚强起来。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黑兰协议的军事方面，在争取实现这个历史性宣言的希望的伟大斗争的现阶段，并不是主要的危险。美国的武力充沛，质量很高。这些武力可以和运用它们来求其实现的政策一般强大有力。单是武力并没有力量，当它们为有害的或愚笨的政策所指导时，还可能对运用它们的国家本身成为一种致命的威胁。

第三章 德黑兰的保证

德黑兰协议决不是能够自动实行，丝毫毋须乎我们去忧虑和工作的。相反地，“德黑兰”要求国家和个人在物质上和智慧上作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它在美国和全世界面前所提出的崇高目标的话。要实现“德黑兰”的前景，只有一个保证。那就是使全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去支持一整套为“德黑兰”的目标和精神所鼓舞和支配的详细的政策。

正确的政策就是对国家利益的正确解释。只有正确地判明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把我们的朋友当朋友看待，把我们的敌人当敌人看待，然后才能定出正确的政策。

这听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并且过于简单，但这是面临我国的

許多最困難問題的真正核心。這樣說並非言過其實：如果美國在過去十年間清楚地區別了自己的朋友和敵人，並且按照這種區別來行動，我們就能夠完全防止現在這次戰爭。

當一個國家為不正確的政策所支配、走到了邏輯的和痛苦的結局時，就像意大利今天一樣，它發現自己處在这样一种艱難的境地，只有歡迎外部的力量，把它從一個合伙的鐵臂之下強制地分裂開來，在這個合伙中它曾耗盡了自己的資源。或者像曼訥海統治下的芬蘭一樣，它發現自己變成了一伙罪惡的伙伴們的奴隸，它曾邀請他們到自己家裏來，執行一個共同的罪惡目的，但即使當它最後了解到“罪惡不會帶來好處”時，他們仍然拒絕退出這種冒險。或者像德國一樣，已經完全向它自己的罪惡的地下世界投降，即使面臨着整個民族被消滅的命運，也不能找到從事反抗的內部力量。

我們自己的國家，美國，曾經逃脫了“喝干這杯苦酒”的命運。但是許多年來，我們也在飲不正確的政策毒汁。我們深深糾纏在整個慕尼黑勾當的令人嫌惡的和悲劇性的回憶之中，我們還有待於完成使我們的實際的和詳細的政策擺脫慕尼黑主義的過程。

這些都是極其不愉快的追憶，我們只在這樣的限度以內提到它們：即在為了肅清至今仍在毒害我們的政治生活的某些過去的危險殘迹所必要的限度以內。

這次戰爭對美國提出了它的一些最困難的問題，即把朋友和敵人繼續混淆。讓我們略為考察一下，這樣的一些混淆在一般報紙的態度上是如何反應出來的：

1. 把曼訥海的芬蘭說成是“朋友”，我們為了“不幸的權宜之計”犧牲了它，對它的處境我們應有“深厚的同情”。

2. 把深深卷入同納粹合作中的波兰流亡政府当作英美的被保护者看待，而把波兰国内正在兴起的民主陣营說成是一种“斯大林的离間”。

3. 把对南斯拉夫铁托元帅所作的拖延已久的承认和援助不是解釋为对我们的政策的糾正，而是解釋为一种对苏联所作的不幸的、也許是必要的“让步”；对于納粹代理人米哈洛維奇，即使在丘吉尔正式地把他埋葬在历史的死尸灰缸中的时刻，我們还称贊他是另外一个这样的朋友，由于战争的无法解釋的災难，逼得我們違背自己的願望拋棄了他。

4. 他們繼續拖延对意大利实行在莫斯科會議所商定的政策，同时对巴多里奧—維克托·伊曼紐尔影子政府恋恋不舍，这是意大利人民差不多像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深恶痛絕的；把意大利各民主政党的联盟——解放委员会依然看作是和我们敌对的力量，不予信任，而不是让它参加政府，作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5. 在西班牙，他們繼續支持希特勒的傀儡佛朗哥执政，而他的国际組織“长枪会”正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活动，构成希特勒的諜报网，对亲联合国家的那些政府組織顛复活动，已經在阿根廷和玻利維亚建立了两个明目張胆地拥护納粹制度的政府。

6. 最后，但决不是最末一个例子，还有中国的局势。他們依然贊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原来的借口，即所謂“鎮压共产党”的必要性，这就是要控制中华民国的国家生活，并冻结住最大的、訓練和装备最好的中国军队，从而让日本人在大陆上可以相当地放手行事。

对于国际政策上所有这六个主要問題，国务卿赫尔十分显

然是在小心謹慎地擬訂一個同我們明顯的國家利益和聯合國家的概念更加明白地互相協調的現實的和可行的政策。但他被美國國內的重大阻力嚴重地阻礙着，降低了進度，這種阻力是通過美國大多數的日報表現出來的。

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產生這種混亂的根本原因，是有一點和希特勒共同的东西頑強地存在着：畏懼蘇聯，視為“布爾什維主義的威脅”，和畏懼所有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視為“革命風暴的威脅”。

德黑蘭協議為解決我國外交政策中的這個根本矛盾提供了基礎和起點。“德黑蘭”的保證是：我們要使我們一切的具体政策都同“德黑蘭”的精神和文字相符合，它們在國際關係方面，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同社會主義民主國家之間；在各國內部，在所有的民主政黨——包括共產黨——之間，提供長期的信任和合作。

達到這個目標的障礙，幾乎完全是由所謂爭執問題的雙方堅持陳舊的偏見和思想方法造成的。生活的現實絕對有利於德黑蘭政策，有利於它在聯合國家每一成員的內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執行。

“德黑蘭”提供了勝利的鎖鑰，不但在歐洲，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

在開羅舉行的丘吉爾、羅斯福和蔣介石的會議具有異常重大的意義，這只有在“德黑蘭”提供的前景之下，才能充分認識到。這次會議規定了对日本的軍事政策的輪廓，並且保證中國在戰後世界中取得應有的地位，從而奠定了基礎，可以按照在德黑蘭為歐洲比較詳細地規定的路綫，制訂一個遠東方面的政治策略。

可是在中國，我們依然面臨着在這個共和國內部沒有解決的一個主要危機，這對我們在世界的這一部分的作戰努力來

說，是最大的、无比的威胁。只有勇敢地实行同在德黑兰制訂的政策相类似的政策，才能以有利于整个联合国家的方式解决这个危机。

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还只是在形式上联合在蔣介石之下。事实上他們是两个不同的陣营，从1927年到1937年他們之間进行了十年的內战，只在1937年面临日本的大举侵略，他們才达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合”，比較地更像停战，但常被打断。即使这个形式上的联合也常有陷于破裂、重新发生內战的危險，自从1943年年中以来，这种危險已經特別严重。

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內战，这对于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无異是一场重大的灾难。这将是日本在战略上的一次重大的胜利，它的势力在中国会得到巨大的擴張。如果美国和英国力所能及，它們必須避免这种威胁。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正在于避免这一类危害我們世界地位的威胁。

中国問題以巨大的規模代表着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問題的主要特点，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即：苏联并未直接参与远东方面的战争。对美国來說，这是一个如何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联合我們的一切朋友进行共同的斗争，并避免发生任何有利于我們敌人的事情的問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以促进和保证中国的全国团结、来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为其目的。

有人反对这样一种美国政策，說它会构成对中国內政的外来干涉。但这是曲意規避现实問題。中国和美国是在进行一次共同的战争，在作战过程中，美国有责任使中国相信，我們是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去击败敌人，并对中国本身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时中国也有责任使美国相信，它正在使用它的全部兵力，而不只是一部分兵力，而送到中国去的美国物资是为

所有願意打日本的中国人所利用，不是由某些中国人用来打其他的中国人。这样的問題必不可免的要在这两个强国之間来共同討論和解决。这不是它們任何一国的“內政和私事”。如果剛剛从十年內战中走出来就参加世界战争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如果是中国把物資送到美国来，那末中国人必定会要求美国保证我們全国的团結来为共同作战而努力，反对重新掀起过去的內战，那会使我們暴露在共同的敌人面前。

奇怪的是，这样的基本命題在美国还必须繼續討論。其所以如此，仅仅因为美国的輿論依然为这样的偏見所左右，这种偏見是同在中国制造內战的那些力量彼此相投的。在美国，在我們的法律和行政實踐中，我們依然保持这样的概念，即共产党人是一种顛复的力量，是全国的敌人，必須加以鎮压。这在我們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歪曲；但在中国，这就造成了永远存在的內战和破坏共同作战努力的威胁。显然我們不能令人信服地敦促中国人放棄我們在美国依然怀抱的偏見。

在中国有通过妥协来取得团結的絕對必要性，不随对分裂中华民国为两个陣营的那些問題的孰是孰非如何判断为轉移。其所以有这种絕對的必要性，是因为已經证明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团結，因为繼續的分裂使我們遭到被日本人取得胜利的威胁。蔣介石通过十年的努力，有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积极帮助，有英国和美国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尙且不能用武力統一中国，而說他現在却能够做到，那真是荒謬絕倫。重庆方面用武力扫蕩中国西北自治边区的任何企图，它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結果，会是亲日各派在重庆取得权力。

可是，对美国人來說，當我們深入力量对比的赤裸裸的問題背后，用最簡單的民主原則去衡量两个陣营的相对价值时，主張

在中国通过妥协来达到团结的理由就更加充足了。在中国的所谓“共产党”阵营（因为它是由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的），比所谓国民党阵营更为接近美国的民主观念；在各个方面都要接近一些，包括在经济生活中给予“自由企业”以更大的活动范围。而那个阵营对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比起国民党阵营更要接近一千倍。

这类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简单事实已为每一个不怀偏见的美国见证人所证实，他们根据对两种地区的亲身观察写成了报告。其中最突出的是我们美国的陆军中校伊凡斯·卡尔逊，他写了《中国的一对明星》[Twin Stars of China]一书；在现在上演的影片《巩荷》[Gung Ho]——这是记录美国在太平洋第一次进攻的影片——中，能够感到中国英勇的共产党人对我们自己的军事行动所作的贡献。具有同一效果的最近一个证据，就是伊洛娜·腊耳夫·修斯所写的《鱼翅和小米》[Shark's Fins and Millet]这本值得注意的书，这个妇人去到中国时，带着一套先入为主之见和完全有利于国民党的背景，但当她在中国居住几年以后，她变成了作为中国民主真正代表的西北边区政府的雄辩的卫护者。

在中国究竟谁是美国的真正朋友，这个问题的最后标准，可以从考察下面这个问题来得到：如果防止内战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迫在眉睫的战争终于爆发，情形将是怎样？日本能从哪一派补充新的中国同盟者，使之参加自己在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呢？除了指出在重庆的最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以外，没有人能提出其他的答复。能依靠什么力量去维持中国对日抗战到底，不问情况如何变化呢？没有人不能首先指出是八路军和西北自治边区。

这些人，美国在中国的最可靠的朋友，数年来一直担负对日作战的一半责任。但他们从重庆中央政府那里实际上没有得到金钱、武器、弹药或是医药供应。相反地，他们一直被封锁着，这种封锁使他们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隔绝，这种封锁是由重庆政府用最大的、训练和装备最好的部队全神贯注地实行的，而这些部队是应当用来打日本人的。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物资中，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送到了西北自治边区的部队手里，而许多的美国物资却被用来打他们！

如果我们开始应用德黑兰协议的原则于远东（终究我们必定要这样作），我们就可以保全无数美国男儿的生命，并且使胜利更快地来到。我们要在中国西北自治边区设立美国的军事和领事代表机构；我们要把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一部分按照这些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比例送到他们手中；我们要以“德黑兰”和大西洋宪章的精神，敦促重庆政府响应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经常提出的全国团结和开始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吁。

德黑兰协议已经开始在解决欧洲的许多棘手问题，这些问题在本质上和中国问题的性质一样。

德黑兰协议中所包含的胜利和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的保证是否有效，那就要看我们美国是否也用这个协议的精神来制订我们的全部实际政策和规范我们在全世界所有各处的行动。只有在我們自己国家的实际政策中，我们才能找到“德黑兰”的保证。

“德黑兰”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和阶级给予自觉的和实际的支持。它必须由构成一个有效多数的美国人来实行。否则它就会失败，它所带来的一切希望均将在日益高涨的混乱浪潮中化归乌有。

第二編 战争决定着战后的世界

第四章 英苏美联盟

空談战后世界的面貌是无益的，除非我們能够表明这个世界将如何从战争胜利之中出現。如果我們不承认必将从这种胜利中产生的那样一个战后世界，就不可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含有一种內在的必然性，它使思想信仰极不相同的人和國家團結起来，实行合作。单是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國家才成为一个实际可行的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为联合國家核心的英苏美联盟已經成为今天历史上的中心事实。

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德黑兰觉得能够宣布，他們的政府决定“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可以认为，因为他們首先觉得有些必要，他們才觉得能够这样說。如果没有这种必要，他們多半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有許多入——甚至有一些脱离正道的共产党人——认为，当考虑如何最快地打胜仗时，却把战后問題牽涉在內，这三个大政治家是誤入迷途，自討苦吃。他們引証說，“一天的問題一天解决就够了”^①；他們想要知道，为什么我們不能集中精

① 套用《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六章第34节的最后一句，該节原文为：“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譯者

神于贏得战争胜利，而把恼人的和平问题留待战争结束以后去处理。这种忠告之所以难于接受，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被试验过了，而经验证明它是不可行的。

从珍珠港事件到德黑兰会议的两年中间，联盟曾专心致力于进行军事斗争，没有涉及关于较大的政治问题的协议。没有理由怀疑，军事计划本身是准备得充分的。即使是关于最困难的联合作战即第二战场问题，早在1942年6月军事协议即已宣布于世。但在我下笔的时刻，即差不多是两年以后，第二战场还有待于开辟。

为什么我们对在德黑兰宣布的军事协议比对1942年的协议能够更有信心呢？

我们能够相信第二战场决不会再拖延下去，其主要的理由是，在“德黑兰”中，军事协议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关于从战争中产生的世界面貌所怀抱的共同政策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第二战场的拖延主要不是由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阻碍，由于缺乏共同一致的意见；究竟开辟第二战场将会得到的胜利用来干什么呢？

英苏美联盟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安排，还不够强大有力到用来取得胜利。在它的军事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效力以前，它还必须在包括战后世界某些关键问题的共同政策、世界政策、长期政策方面得到加强，得到支持。

对于这种历史的既成事实加以嘲弄或抱怨，不论对我们自己或对世界都没有丝毫好处。这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认识：我们的国家怎样才能度过战争危机，尽可能多多地挽救我们战前的文化，使世界再度回到进步的轨道上，而以现在这个世界作为我们的起点。

从世界上清除希特勒主义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必须流血的工作。那是如此的困难，以致我们如欲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开始改变希特勒主义所从而产生的根本情况之一。

必须改变的这个根本情况，就是反希特勒阵营分成两个部分，它们对于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的纲领或看法——这就是反希特勒联盟中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既然任何一方不能消灭其他一方，唯一的超出这种划分的办法就是每一方使自己适合其他一方，不是从它们自己的愿望和意识形态去求得一个共同的纲领和看法，而是从它们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去求得这种纲领和看法，这种协议将保全每一方的最重大的利益，从而为重建整个世界各国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达成协议的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有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可以作证，他们在德黑兰共同宣称，他们“检讨了将来的诸问题”，他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而这种永久的和平，正如他们所下的定义，是将“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的和平。

美国人民中的有效多数能够像“德黑兰”那样高瞻远瞩，全心全意参加这个由罗斯福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一道，以他们的名义所作的宣言吗？

在美国，对“德黑兰”很少公开的反对。但不幸的是，暗中的反对甚至更加危险。美国报纸引导它们的读者把“德黑兰”看成“不过是又一次会议”，其主要目的只在使事务继续进行，直到有另一次会议来代替它为止。即使温德耳·威尔基——他的十分成功的《一个世界》一书曾使许多人对他期望更高——也对“德黑兰”表示了一个离奇的想法，他说这是一个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马贩子交易的地方，他设想自己如在那边，他能够比罗斯福从斯

大林和丘吉尔手中得到更多的让步！

威尔基先生的嘲弄，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对一个现任总统，根据古老的然而并不光彩的美国传统，所作的当然的、不假思索的、从党派出发的暗中狙击；这是够糟的了，它暴露了我国在1944年的选举运动中将要经历的某些严重危机。如果任何重要部分的有思想的美国人以此作为判断的基础，那就更糟。因为这样就把“德黑兰”要从希特勒手中夺取的武器交还给他，这个武器就是玩弄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在英国同美国之间的所谓不可调和的分歧。

如果“德黑兰”只不过是世界政治中一场激烈的马贩子交易，那末这本书根本就一文不值了——除非我们这样看：如果美国和世界想要逃脱前所未有的悲剧，我们所描绘的“德黑兰”还是必须出现的。

就我来说，我把德黑兰宣言看成是表里一致的。我反对对“德黑兰”作嘲弄的评价，不问其来自威尔基或任何其他的人。在怀疑“德黑兰”的效力的每一个声音中，我听到了希特勒新年致词的回音！

自然，参加德黑兰会议的政治家们曾经面临巨大的困难。而在实现这个协议时，自然还有巨大的困难需要克服。但对德黑兰协议来说，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阻碍和最大的危险却在于不能提高到或拒绝提高到这样的眼界和认识：协议是必要的，是可能的，它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毫无例外！

甚至一些共产党人——人数不多——也落到了对“德黑兰”作嘲弄的评价的圈套里，这是可悲的，然而真实的。自然，他们对它有一种特别看法。他们夸耀斯大林是怎样一种“精明的人”，

他怎样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得到成功”；他们确有把握地辯解說，一个丘吉尔能够从“德黑兰”得到的全部好处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人幸而不自觉这个事实：他们只是从反面重复托洛茨基分子的话，而这两种说法都是从希特勒抄来的。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所表现的偉大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更高的政治家水平上行事，他们寻求并且找到了能够用共同行动去推进的共同利益，丝毫没有怀疑任何一方会损人利己。

国际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实自然是，正是由于“德黑兰”的结果，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处境，就它们的全部问题来说，已经大大改善了。因为“德黑兰”代表着那样一种因素，没有它，整个世界就有毁灭的危险——这是在滔天变动中的可靠的方位，是普遍无政府状态中的世界组织的起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治家，每一个人，如果他离开了德黑兰政策，就将发现自己茫茫然不知所之。为什么我们能够完全相信德黑兰协议的永久性，这就是最后的理由。

德黑兰协议所倡导的世界政策的轮廓，在一切有理智的观察家们看来是明白的。而有名的和聪明的道乐赛·湯普逊却令人啼笑皆非：她在评论我的对德黑兰估价的小册子时，却发现它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是斯大林的声音”，透露着在伊朗会议中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秘密消息。我可以向湯普逊小姐保证，就消息而论，我得到的肯定不比她多；我们之间的不同完全在于，当我们得到消息之后，各自如何来处理它。但必须说明，湯普逊小姐虽从完全错误的前提出发，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德黑兰会议达成了真正的协议，这种协议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

要知道这个協議的一般政治綱領，肯定不必安置下通向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宮或白宮的秘密綫路。事实上，这样說是更为正确的，依靠“內部消息”的人表明他們不能理解众所周知的生活中的政治事实。“外部消息”才是有决定意义的。

一个協議的首要之点是：英国和美国以平等地位对待苏联，并且就一个共同的軍事綱領取得一致的意見，这在德黑兰會議之前是沒有作到的。然而，为了使英美作出这个重大的政策轉变，必須使它們相信：一支胜利的紅軍不会在它的刺刀上把苏維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帶到英国海峡东面的欧洲其余各处。一旦互相作出了这种基本的让步，通过談判解决所有一切具体問題的道路便打开了。

科德耳·赫尔在莫斯科外长會議上率先表明有可能达成德黑兰協議。他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是开始走上这条新的道路的美国統治階級中最不願意和最抱怀疑的那些集团的选定代言人。当赫尔富有信心地前进时，美国最坚决和最保守的集团的立場便表明出来了。于是总统能够确有把握地去到德黑兰，相信自己所代表的是包括所有一切階級和政党的最高負責人在內的團結一致的国家。

因此，必須把莫斯科會議看成是德黑兰協議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考察一下莫斯科會議的成就是具有永久价值的。莫斯科會議联合公报記載着：“首先，对于为縮短对德国及其欧洲卫星国战争所应采的措施方面曾有率直的和詳尽的討論”，大家认为这将为“三国間将来軍事上最緊密的合作建立一个基础”。公报繼續申述協議的內容，整段全文如次：^①

^① 下面和上面两处所引联合公报的譯文，均系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頁。——譯者

“仅次于迅速结束战争的重要性，就是三国政府一致认为在战争结束后期间内继续目前在进行战争时的紧密协力和合作，对于它们本身的国家利益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和平并充分促进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

在莫斯科协议宣布之后，我立即写了一篇评论，鉴于后来发生的争论，我认为必须在此地重述一遍，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曾用下面的话来总结莫斯科会议的意义：

“莫斯科外长会议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议，为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主席的将来会晤铺平道路。在会议之前，曾注意到不要使人对会议工作的直接结果产生过高的希望，因为一般预期，重大的协议只有在以后的首脑会议上才能达成。

“和上述预期相反，莫斯科会议本身作出了基本的协议，这已经建立了领导联合国家的三国联盟的前进路线。它的成就是超出全部预期的。

“然而计划中的联盟首脑会议并不因这种成就而成为不再必要，也不会延期举行。正像红军的巨大胜利，以及英美在非洲和意大利的进攻与对德空中作战扩大了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一样，现在由于莫斯科会议对轴心国和绥靖者在政治上的打击而得到增强的、加速取得的军事胜利，更加布置好了历史的舞台，使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晤能沿着同一方向进一步采取行动。……”

“世界已经在它自己的历史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①

这样，莫斯科—开罗—德黑兰是一个连贯的系列，构成一幅

^① “莫斯科三大强国会议”，《共产党人》，1943年12月号，写于11月初。

整个图画，我們現在简单地称之为“德黑兰”。

使協議能够具备形体和精神的政策綱領，可以归納于下：使欧洲人民民主革命放手进行，肃清专制主义，和动员联合的人民力量，同列强合作，求得他們自己的解放；对每一个被解放国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留待获得胜利之后再作最后决定，那时每个国家将要自由地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不受国外的任何干涉；对每一个国家內部的各个集团和領袖的支持，完全根据他們在反对納粹侵略者的战争中和在他們自己国家的解放事业中作出的有效的貢獻，絕對不根据意識形态上的考虑，或任何預先决定一国战后命运的願望。

这种政策要求所有願意奉行它的人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反对納粹这个敌人及其奸細代理人，这也意味着在每一国的民族解放陣綫中尽量减少一切內部斗争，如可能时就完全消除它。在每一个国家中，必須建立一个广大的、无所不包的反法西斯陣营，在这个陣营內部，一切关系的确定，所有問題的解决，均通过自由討論、自由的政治結社和普遍选举制。在每一个国家內部的这种民主的全国性的联盟，必須向一切願意对納粹作战并在英苏美联盟的普遍世界领导下遵守共同紀律的人开門，不根据互相冲突的意識形态作任何的差別待遇。

这对美国提出了一个根本問題，它还未得到澄清和解决，这就是沒有差別待遇、沒有特別法律、在和对待所有其他政治派別相同的基础上接納共产党人加入民主力量的共同陣营問題。

這個問題就其國內的政治方面來說，将在本书下一編中詳細討論。但在这个时候，作为我們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問題，使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它。提出這個問題的最好的方式也許是举出很具体的例子，連姓名和地址都有。

查尔斯·波勒提中校是美国在意大利的联合军事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他是一个原籍为意大利的美国人。在意大利，他是决定我们和意大利解放委员会的关系的人物，后者是所有意大利民主人士的六党联盟，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人都在内。他利用他在意大利的地位告诉意大利的民主人士：美国要求他们解散他们的联合战线，他们必须把意大利共产党人驱逐出去，否则就不和他们打任何的交道。他用他在美国所站的对待美国共产党人的同样立场去为他的这个要求辩护，这就是纽约劳工和政治运动中安托尼尼一波普一杜宾斯基派的立场。他说他不能用一种态度对待本国的共产党人，然后又用另一种不同的态度去对待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他拒绝在意大利实行莫斯科外长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这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的美国部队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动员意大利人民反击德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执笔时，意大利战场还是在“冻结”中，我们人数众多的美国和英国士兵，从千百万迫切要求有机会同他们并肩作战的意大利人民那里，只得到了有限的援助。

波勒提的朋友们，纽约社会民主联盟，通过了一个特别决议，敦促我们在华盛顿的政府从自己的机关、特别是设在海外的机关中把所有的美国共产党人清除出去，并且声明这是为防止执行德黑兰政策所必需的！！

在这个小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实现德黑兰政策的那种顽固的障碍，这种障碍是从我们自己的国内政治生活中直接产生的，它严重地削弱着英苏美联盟。

另外一个例子：紧接着德黑兰会议之后，英国职工大会发出呼籲，要求联盟各国和中立国的工会派出代表举行国际会议，制订劳工们在赢得战争和重建世界中的行动纲领。为了德黑兰

協議的完全勝利，這樣一步顯然是必要的。然而，恰好是在美國，這種步驟卻被拒絕了——為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所拒絕——，理由是不可能同意和共產黨人進行任何方式的合作，蘇聯的工會將要派出著名的共產黨人作代表，他們同時又是在蘇維埃政府中身居高位的!!!

很清楚，“德黑蘭”的道路，鞏固英蘇美聯盟的道路，爭取戰爭勝利和世世代代持久和平的道路，對我們國家來說不是容易走的道路。我們看到，不可能在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築上一條中國式的長城。我們看到，在我國國內生活中，許多仍然起支配作用的最呆板和最僵硬的政策，同德黑蘭的對外政策是根本不能協調的。

這只是意味着，德黑蘭的政策必須爭取，它不會自己從天而降。凡是梗在勝利和持久和平途中的障礙物，必須一一推開。“德黑蘭”跟美國的国家利益、跟所有一切大小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除了國際無政府狀態和混亂之外，再沒有其他可行的另一條道路。

第五章 歐洲的復興

蘇聯前綫以西的歐洲差不多全部還在希特勒主義的掌握中，必須用火和劍來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把它從血腥的魔掌中拯救出來。

戰後歐洲的面貌將為爭取歐洲解放的鬥爭進程所決定。

科德耳·赫爾在1942年就定下了這個基本原則，那時他在一個綱領性的演說中警告歐洲各國不要期望完全依靠外部力量的拯救，它們的權利也將為它們參加解放自己的鬥爭的程度所

决定。在莫斯科会议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中，又作了同样的警告。

用更率直和更浅显的话来说出这个原则就是：战后欧洲的建筑师将被从在杀纳粹分子时表现自己有最大能力的人们中间挑选，大致比照他们执行这个任务的情况而进行。这是在美国常被忽视的、生活中无可逃避的事实之一；在那里没有一个报纸专栏作家是如此可怜，以至不能至少每月一次在自己脑海中勾出一幅欧洲新地图，在那里一个玩牌专家能够在业余时间画出一幅战后世界地图，赢得妇女俱乐部、辩论会、各种“知识分子”、以及《纽约时报》“书籍评论”栏的热烈赞扬。

“德黑兰”并没有取消这个把权利和责任联系起来的原则，而只是达成了一种协议，这种协议包括了这个原则，使它成为在所有杀纳粹的人中间达到政策上的一致的“暂定条约”，以便他们不致把自己的力量彼此抵消，并且最后弄到互相残杀。“德黑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从事歼大多数纳粹的三个主要强国之间的协议，为了一个共同商定的结果，去更加有效地杀纳粹。

既然我们没有野心去制定一张包罗万有的蓝图，我们可以把我们关于欧洲复兴的讨论加以限制，只就现在解决问题的各种不同方式举几个例子来谈谈，先从波兰开始。

战前的波兰政府疯狂地拒绝同苏联实行任何合作，自己投入希特勒的怀抱，和他一道蹂躏捷克斯洛伐克，这就签定了它自己的死亡判决书。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它又拒绝了苏联的援助。结果，当希特勒转向他的波兰“朋友”时，它在几星期之内便被征服了。苏联进而干预，暂时保全了波兰在1920年所攫取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直到1941年6月以前，在伦敦组织的波兰流亡政府除了等待什么事情会发生之外，既无奋斗目标，亦

未发生作用。当希特勒侵略苏联时，西科斯基代表流亡政府同莫斯科签订了条约，从而在1941年即已达成协议，如果波兰人曾经忠实地执行它，必然已使流亡政府处于非常坚固的地位。

但是流亡的波兰领导表明自己不能忠实地履行义务。当它在苏联境内组织了一支由避难者和出狱者构成的波兰军队，用苏联的钱将它装备和武装起来以后，它拒绝把这支军队派到东线作战，将其经由伊朗调到近东，替英国人担任卫戍。它利用自己在苏联领土上的代表机关收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后来神秘地落到了希特勒手中；并组织失败主义者的和颠覆性的骚扰，由于这种罪状，“社会主义者”埃尔利希和奥尔特被枪毙了。末了，成为毁灭原因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它在卡通森林大屠杀中参加了希特勒的凶杀挑衅，这是波兰流亡者直接响应柏林而在苏联大门口犯下的一次希特勒罪行。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了一切关系。留在苏联的流亡者组成了波兰爱国者联合会，并开始建立波兰军队，同红军一道作战。

当红军长驱直达波兰边境即将解放波兰时，这个背信弃义的流亡政府对自己在波兰境内的追随者下命令，叫他们在红军来到时即予抵抗，虽然三年以来它一贯命令他们不要抵抗纳粹。从波兰境内得到了无数的证据，证明这些先生们一直和纳粹勾结，共同消灭在此期间一直进行游击战争、抵抗纳粹的波兰爱国者。

波兰流亡政府对苏联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它只要求红军赶走纳粹，把1939年解放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重新置于波兰暴政之下，并用红军的刺刀把这些流亡的先生们送回去重新统治波兰人民，以便他们继续在国际范围内从事恶毒的反苏活动。他们依靠英国和美国的力量，把这些“小小的”要求强加于

苏联；因为，他們虽然是盲目的自高自大，他們单独却是完全没有力量的。

“德黑兰”使波兰反动分子的这种恬不知耻的、危险的和有害的伎俩不能得逞。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宣布，英国政府认为苏联对波兰的政策是十分合理的，是以1919年早已宣布的英国公平的判断为基础的。毫无疑问，华盛顿也会追随伦敦之后，不得不出此一着。反动的流亡者們被抛到了空中，看来他們頑固地坚持要留在那里，自作自受。

然而真正波兰的前途却日益光明。紅軍坚决地向前推进，在伯令將軍統率之下的波兰爱国军队同它一道。当它进入波兰国境后，波兰人民毫无疑问的会立即建立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机关，竭尽他們的全部力量参加战争，全面参加他們自己的解放事业。波兰将从苦海中得到新生，肃清給它带来毁灭的卖国领导，在人民政权之下强盛起来，变成一个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发展过的民主国家。

伦敦的波兰流亡者們如果不是妄想离間华盛顿和伦敦一方，同莫斯科一方，就决不会从事反对苏联的猖狂的和自杀的冒险。他們激烈反对德黑兰协议。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反希特勒联盟的分裂和解体，——总之，他們还在妄想希特勒主义会在欧洲胜利。像所有反对“德黑兰”的人們一样，他們是自寻絕路。

和波兰流亡政府刚刚相反，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建設性的，前后一致的。这就应当提醒我們，不要对一切流亡政府作任何普遍的結論。这个政府有它的弱点，并且还是严重的弱点，但它从来没有从事阴谋活动，去削弱或分裂英苏美联盟，也没有企图去利用各大强国間被推测的意見分歧。它一贯拥护团结，自从慕尼黑以来，它表明日益認識到，它同苏联的

密切合作是它对在这次战争胜利以后的持久和平的最好的保证。它是建立在所有民主党派的联盟之上的，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只在放松争取胜利的斗争和迟迟不肯拿起武器时，前途才会变得黯淡。

南斯拉夫为欧洲的解放和复兴过程提供了另一种样式。1944年春天，当作者正在执笔时，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紧跟着纳粹入侵的后面，在南斯拉夫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人民政府和一支人民军队，它在反抗侵略者同时又反击国王彼得的伦敦流亡政府的代理人中，取得了奇迹般的军事胜利。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铁托元帅的名字，已为全世界所熟知。最后，温斯顿·丘吉尔在议会中说话了，他坦白而豪爽地承认铁托元帅及其政府对联合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也同样坦白地拒绝了叛徒米哈洛维奇。

只在几个月之前，这个问题看来是多么不同啊！

为了说明美国要制定一个关于欧洲问题的正确政策是觉得何等困难，我情不自禁地要打破我的一个惯例，来讲一个“内部消息”。1942年10月，纽约美国劳工党中的杜宾斯基—《新领袖》集团决定说服检察总长比德耳去镇压《工人日报》，以便拔去他们这个眼中钉。他们决定，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控告《工人日报》攻击“我们的盟友”米哈洛维奇将军，因而破坏了联合国家的团结。他们把这个计划提到他们的密友和同党助理国务卿小阿道夫·伯利面前。伯利热烈赞同，把这件事向比德耳提出，后者就这件事在司法部内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某些参加者略为表示忸怩和踌躇以后，“会议”终于“在原则上同意”伯利的提议，但决定在着手进行之前，先把这件事正式跟陆军情报局和国务院说个清楚；对《工人日报》很幸运，这两个机关

都回話，要把米哈洛維奇同希特勒的关系“透露”一下，一个下級人員說这是“新消息”。

然而，从那以后已經一年多，美国报纸一般还是继续对米哈洛維奇大声疾呼地支持，对铁托元帅及其同伴同样大声疾呼地痛罵，称他們为“共匪”。所有报纸关于南斯拉夫的报道都是在有系統地欺騙我国人民，只有《工人日报》（以及少数外文日报）是例外，虽然英国和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完全知道米哈洛維奇同希特勒、墨索里尼所干的叛卖勾当。只有路易斯·阿达米克在1943年年終出版的轰动一时的《我的故乡》一书，以其具有摧毁力量的和无可辯駁的事实記載，才最后突破了关于南斯拉夫真实情况的新聞封鎖。在阿达米克的书出版不久，苏茲貝格从开罗給《紐約时报》拍来了一个同样轰动一时的电报，泄露他早已知道但以前从来没有敢报道的事实。

很显然，英国、苏联和美国在支持南斯拉夫铁托元帅上的一致，以及米哈洛維奇和他的流亡政府是同敌人勾結的叛徒这一事实的揭发，是整个联合国家的胜利。因此，当美国的大报继续把棄絕米哈洛維奇說成是美国和英国的“挫敗”，是“斯大林的令人不安的胜利”时，我們又如何想呢？当我执笔时，当天的《紐約时报》通过它的軍事专家韓森·鮑德溫，把铁托的兴起說成是“許多使人困恼的趋势”之一，这种趋势正在摧毁“自从莫斯科、开罗、德黑兰會議以来对战后世界所怀抱的远大希望”。

韓森·鮑德溫 and 《紐約时报》真正把他們关于“德黑兰”的希望放在这个想法上面，即各大强国应当联合起来，在南斯拉夫支持米哈洛維奇而不支持铁托嗎？由我們担負起替破了产的和失去了信用的希特勒主义同謀者作战的重担，用美国的刺刀恢复他們統治本国人民的权力，把这作为我們推翻他們的老上

司——納粹的軍事行动的一部分，这样作果真是合乎美国利益的嗎？当欧洲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它能够联合所有的进步集团和党派，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人，美国真是感到害怕嗎？欧洲民主的每一个胜利真是英美政策的“挫敗”和“斯大林的胜利”嗎？

如果美国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問題，对韓森·鮑德溫和他这一流人的路綫大声說“不！”，那末“德黑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将要是轉瞬即逝的。因为鮑德溫和他这一流人的路綫将直接造成在欧洲的廢墟中燃起大規模內战的火焰，这种內战即使在希特勒主义被推翻以后，还会繼續和加剧。在这种战争中，鮑德溫要使英国和美国同所有的封建反动势力联合一道，把所有受人欢迎的民主力量都推到苏联的怀抱中去。这会意味着英国和美国最后要把希特勒沒有成功的工作担負起来——用武力消灭苏联。

德黑兰協議就是为了最后地、永远地消除慕尼黑的幽灵这个特殊目的而制訂的。“德黑兰”之所以成为必要，就是要取消作为欧洲各国內部分界綫的这种亲苏联的方針同亲英美的方針的对立，而代之以单一的亲英苏美的方針。

我們对欧洲复兴这个广泛問題所举的例子，已足使我們对整个欧洲体察出这个問題的中心实质（就其在政治上的表現而言），至于国与国間則只有細节上的不同。就对本书提供論据來說，不必一国一国地研究下去。

然而，从要在“德黑兰”体制內实现的美國利益着眼，还得說明一点，才能使欧洲复兴这个中心問題集中于一个突出的焦点上。这是与欧洲的经济有关的。

战前的欧洲经济已經紧紧地和一個国际卡特尔体系連在一起。这个卡特尔体系代表壟断資本同封建与半封建政治势力的

溶合。这是战前纳粹向其邻国渗入的主要渠道，在纳粹德国征服欧洲以后，就把它全部接收过来，作为“新秩序”的骨骼。英国和美国资本中某些集团参与了这个卡特尔体系，从来也没有割断它们的联系，希望在希特勒被打败后把它接收过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拯救它。

这是使英国和美国对维奇法国，对西班牙的佛朗哥，对塞佛埃王室，对米哈洛维奇和国王彼得，对希腊的国王乔治及其法西斯顾问们，对波兰流亡政府等等承担义务的主要影响。它是比温斯顿·丘吉尔对君主政体和正统主义的原则在感情上的依恋更要严重百倍的一种影响。这是实现“德黑兰”希望的主要障碍。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典型的美国自由主义者会立即提出的取消卡特尔这个简单的、信用破产的纲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只要它还存在，其主要特征即将是形成卡特尔的垄断资本的各个巨大集团。唯一可行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在苏联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在希特勒失败之后，这个欧洲卡特尔化经济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已不能存在，不能由英国和美国资本原封不动地或者部分地接收过来。必须将其完全打散，而正在兴起的欧洲民主现在已经在打散它。因为这个欧洲卡特尔体系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是完全由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残余组成的，即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残酷压迫，专制主义和权力主义，军阀制度，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以及外力对整个国家的征服和统治。扫除这一切封建主义的残余是欧洲人民民主革命的实质，同时也是粉碎希特勒主义的必然结果，必不可免地要引起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卡特尔——在一个崭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之内加以重建。

认为任何美国的利益，即使是美国壟断資本的利益，同欧洲这个必要的人民革命难以共存，那是最愚蠢的誤解。事实上，这是使欧洲能够变成美国經濟在資本主义基础上存在下去所絕對必需的有效市場的唯一方法。旧的慕尼黑欧洲必須送进历史的破产法庭中去，一个新的民主的欧洲必須代替它，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話——只有这个新的民主的欧洲，才能——和美国一道——按照为适应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所必需的方式和規模，在世界市場上进行买卖，并且付清帳款。

为了把这个問題說得十分简单，使证券交易所中最忙的和最不开动脑筋的經紀人也能懂得，我們可以說，欧洲的問題好比两种債券，一种是米哈洛維奇发行的，虽有行市，但最蠢的美国人今天也不会出一文錢去购买，另一种是铁托发行的債券，它的价格漲落，全看證券市場对整个欧洲的命运如何判断。因为这很清楚，如果欧洲能避免半个世紀的混乱，在美国金融市場上铁托的名字就要比納粹占領各国任何其他的名字地位更高。这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方法，可以用来判断：就欧洲問題、它的解放和复兴而言，美国資本的真正利益究竟何在。

第六章 亚洲的民族解放

有了罗斯福、蔣介石和丘吉尔的开罗會議的联合宣言作保证，一个全面的亚洲政策的輪廓已經开始出现。

日本通过軍事侵略所占領的全部領土均将被剝夺；从中国窃取的領土将归还中华民国。朝鮮将得到自由和独立。“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項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忍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

作战。”^①

这就是开罗会议的实质。

这个协议从下列各方面得到了补充：美国关于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菲律宾的既定政策，英国和美国取消了在中国的全部治外法权，取消了长期以来阻碍和歪曲中国国家发展的“不平等条约”。

依然完全没有解决的，是大半个亚洲将来的地位问题，即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联邦，印度支那，它们的人口总计在五亿以上。

完全可以设想，开罗会议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策，足以在军事上打败日本，因为在德黑兰已经作出了粉碎纳粹德国的保证，从而使日本孤立起来。

但不可能想像“开罗”足以对亚洲提供作为“德黑兰”核心的那种持久和平，那种长期的战后的世界秩序的前景。

在日本被击败以后，亚洲绝不可能在以任何形式恢复起来的旧的战前殖民帝国体系的基础上稳定下来。一个稳定的亚洲要求有全洲所有主要各族人民的自由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并把它们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纳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之中。

在这个前景没有由各大强国共同提供以前，我们就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前景：从日本手下解放的亚洲各族人民又将处在旧的西方殖民制度之下；我们拒绝同亚洲人民在战后世界中结成伙伴，我们为要求他们帮助打败日本所提供的诱因只是这样一个可疑的许诺：用“好一些的主人”去代替“坏主人”。

这显然和美国的最高利益是不协调的。我国显然必须担负

① 譯文根据《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407页。——譯者

在軍事上击败日本的主要責任；重建旧的殖民制度的前景使这个責任加重了許多倍；但是这样一种复活的殖民制度不会也不能对美国有利，即使对美国壟断資本也沒有利。

那么为什么我們要繼續担負这个不必要的和沒有利的負担呢？

既然对亚洲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最后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不現在作出这种让步，以便从我們肩上減輕太平洋战争的很大一部分負担呢？为什么不讓亚洲林林总总的千百万人民积极参加解放他們自己的斗争呢？就让东方各民族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贏得他們自己的独立，像中国現在所做的那样，不要迫使他們以后来同我們或联盟各国作战去贏得这种独立吧。

对这个問題有一个刻板式的答案：亚洲的民族解放問題是太复杂了，太困难了，在战争中不可能解决，必須留待胜利以后，才能够鎮靜地悠閑地去处理它們。这个答案对亚洲人民來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而与美国的处境更有关系的是：对美国人民來說，那也应当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为了使这个問題变得尽可能的突出和清楚，我想直截了当地來談它的核心，这包含在美国和世界的經濟中，暂时不管这个問題的所有一切其他方面，这些方面由于意識形态上的分歧和先入为主的成見而弄得混乱起来。

使美国不能接受一种在亚洲重建旧的殖民帝国制度的政策的經濟因素是什么呢？主要的考虑是：美国有着至今为止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义經濟，它在战后必須有广闊的市場來容納它的产品，而亚洲就是提供这种市場的主要潜力。这种市場必須具有从前絕對梦想不到的規模，每年达数百亿美元之巨。沒

有这种市場，美国經濟就不能繼續維持下去；这种市場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中的迅速实现，对現行的美国生活方式來說，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必不可少的东西。

处在重建的殖民制度之下的亚洲，对美国需要的市場甚至连很小一部分也不能开始提供。因为一个殖民地的亚洲是貧穷的、落后的、农业的亚洲，是为其他市場儲藏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場所，正是因为这个緣故，它是无法实现其成为美国必須要有的，每年能够吸收我們价值几十亿美元重工业产品的市場的潜在可能性的。能提供美国所必需的那种市場的亚洲，只能是一个使自己迅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亚洲。

在世界的經濟方面的經驗中如果有一个事实是摆得明明白白毫无爭执余地的話，那就是：殖民制度是現代全面工业化的死敌。除非建立在独立、統一和自决的基础上，沒有一个国家曾經实现工业化或者能够实现工业化。

因此，一个以把亚洲变成美国产品的广大市場为目标的政策，就必须以廢除殖民制度而代之以自由的、自治的、統一的国家制度为目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制度所提供的是狹隘的和有限制的市場，而独立的、自治的国家所提供的則是日益扩大的市場。

美国經濟利益还影响我們对亚洲各国内部政治力量配置方面的政策。尽管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国家在国内生活中有自治和自决权这个原則，这一点依然不可避免地是真实的：美国对于各个国家将有何种国内制度要感到关切，必然要据此来制訂自己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当我們抱住存在于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場上的利益时，我們也会找到正确的道路。

从这个观点来简单地考察一下中国的内部問題。中华民国

截然地分成两个阵营，我們的报纸順溜地称之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或是“保守派”和“激进派”。这种称呼包含了这样的假定，我們資本主义的美国觉得它自己的利益是为“国民党”或“保守派”的中国所最好地代表着的，而它对“共产党”或“激进派”的中国就必须皱起眉头。我們在前面几章已經表明，这个假定在軍事和政治領域內是怎样的矛盾。經濟上的考虑更加有力地打破了这种陈旧的偏見和假定。

这是一个可以证明的事实：今天“国民党”中国特有的經濟政策的运用，正在摧毁美国的寄托在扩大的中国市場上的利益，而“共产党”中国的經濟政策則最有利于促进一个扩大的市場。“国民党”中国的反民主的、专断的内部制度是建立在这样的經濟政策上面的，这种政策鼓励地主压迫、投机、市場壟断、高利貸、以及所有各种不是通过发展經濟而是通过对經濟的寄生性掠夺的謀利。而西北边区即所謂“共产党”中国的民主的内部制度則是建立在这样的經濟政策之上的，这种政策限制和減輕地主剝削，禁止投机囤积和壟断市場，对生产領域內的經濟企业听任发展，取締高利貸行为，只鼓励通过扩大生产及采取提高整个社会經濟水平的方式的謀利。

那么，这真是一个中国的“純粹內政問題”，美国对之不應該有一个政策嗎？

美国正在供应中华民国以战争武器，供应的数量不久还要大大增加。如果这些武器不是全部用来打日本人，而是把一大部分轉用来打某一部分中国人民，而这部分人民的政策又最接近美国的經濟利益，这难道真的不干我們的事么？

美国正在供应中华民国数以亿計的貸款，表面上是用来稳定中国的币制。当这些資金被轉用来从事粮食的囤积投机，从

事高利貸，从事通貨操纵，从而造成千百个新的大富翁，并使一切生产事业无利可图从而把民族資本排除在外，还把一种恶性的通貨膨脹加在中国人民身上，这难道真的不干我們的事么？

美国准备在战后对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工业化貸款。如果在中国政府中是这样的人占統治地位，他們否定工业化的整个概念，他們把古老的族长制的封建主义頌揚为“黄金时代”，中国必須回到这个时代去，他們认为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科学和民主的“外来”影响的“侵入”中国，这难道真的不干我們的事么？

毫无問題，如果美国同中国还要发生任何关系，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使这些問題也成为我們的事务的一部分；我們对之必須有一个政策。而既然能代表美国在中国的最高利益的政策同时又是代表着数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民主自治扩大的政策，这就更加是必要的。

美国政策問題的实质对整个亚洲都是一样；在对一个国家与对另一个国家間，它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在印度支那、馬来亚、緬甸和印度尼西亚，基本的問題被法国、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掩盖起来了。很显然，美国不願也不能仅仅为了重新建立那个古旧的、腐敗的、和已經完全衰朽的殖民制度，来把太平洋战争进行到底，直至取得胜利。并且这一点正在变得明显起来：不能把这个問題延到战后再行考虑，而不使胜利的代价倍增，超过任何可以忍受的限度。

印度是殖民地的远东大陆唯一沒有受到日本侵略浪头首先冲击的地区，它使基本的問題以其最复杂的形式表現出来。在这里，美国武装部队不只是直接用来驅逐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和准备收复淪陷的領土，同时还出乎意外地，并且同美国的利益

相違背，用来支持英国的殖民政府，使之繼續維持下去，这个政府是同日本人在新加坡以及远东其余各地一举而将其击碎的政府一样的腐敗、过时和有害的。

不待研究英法荷兰殖民帝国問題的詳情細节，一望而知：在击败德国和日本以后，有秩序地、和平地解决問題的一綫希望，全系乎英美两国的利益能否通过一个共同政策調和起来，这个政策同时又会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解放出来。

英国人这样死死抓住他們已經过时的殖民制度不肯放手的主要理由，不在于所謂英国民族性格中固有的保守主义或不通权变。毋宁說必須从这个事实去看：英国人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避免为美国資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所压倒。处在一个国与国間进行自由貿易的世界中，并且被剝夺了他們从前对殖民地的壟断权利以后，英国資本家不能看到有同他們的美国敌手进行胜利竞争的希望。这是英国人一向就有的恐惧心理，而由于战时美国工厂生产能力的惊人扩张，这种恐惧更是加强了百倍。除非英国資本这种确有理由的恐惧能够稍稍得到消除，对亚洲制定一个长期的共同政策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因此，一个以稳定亚洲为目标的英美共同的政治路綫必須建立在这样一种經濟協議之上：这种協議將要在保证經濟上較弱的国家得到按比例的一定份額的限度內，限制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彼此自由竞争。沒有这样一种保证，那个較弱的国家决不肯自願放棄其对殖民地壟断的历史权利，而沒有这种让步，任何持久的和平时期是絲毫沒有可能的。

然而，即使这样还不能单独奠定亚洲稳定的体制。苏联沒有直接卷入世界战争的远东方面，但它依然是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对涉及亚洲关系的任何长期体制的积极合作是絕對必要的。

英国和美国对亚洲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必须是这样的性质，即它是苏联赞成的，并且会参加来实行的。

这样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协议，现在就拟订出来并向世界宣布，对于世界会有一些不可估计的好处。它将夺去日本强盗的一个武器——他们使用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政治口号。

它将立即开始调动整个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成为我们在战争中的积极的盟友。

它将使英国同美国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归于消失，这种矛盾妨碍在太平洋地区制订出共同的战略和策略。

它将促进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统一和民主化，使它们能在胜利的时刻立即开始实行有效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

它将奠下基础，使苏联能积极参与远东的稳定工作。

它将在亚洲如同在欧洲一样，创造必要的经济和政治前提，去实现“德黑兰”关于从世界上为未来的世世代代消除可怕的战争灾难的希望。

第七章 非洲和近东

就长期的世界政策来说，非洲依然是极其模糊之点。在它现在的政治和经济情势中，并不包含单一的、主要的因素可以使之获得稳定。不去探讨构成非洲这幅画图的使人迷惑的细节，但看一看能否为美国找出一个以解决某些主要矛盾为目标的可行的长期政策，也还是有价值的。

非洲领土和人口的绝大部分处于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制度之下。这个制度是和美国的利益矛盾的，它肯定得不到苏联的同情，它是中国所痛恨的。同时它压迫大约一亿五千万土著居民，

使一个富饒的大陆变成极端貧困，阻碍任何趋向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发展。

在非洲的現狀上到处写下了“不稳定”的字样。美国从它在德黑兰協議体制內及其世界前景下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观点来看非洲，必須有一个非洲政策，但是現在还没有这样一种政策。非洲同其余世界的关系，非洲內部生活的組織，都必然要发生变化，关于这种变化的形式和內容的决定，美国肯定是能有所貢獻的。然而美国这种政策究竟如何，尚有待于确定。

美国自己也挤进英国和法国中間去一道参加非洲的殖民制度这一类想法的必須被摺棄，我认为是不必多費笔墨的。这是在二十世紀中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大为加强了对世界的破坏。这同美国的利益和意識形态是如此明显地相反，可以不必去討論它。

一个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如果要切实可行，必須具有一定的特点，这种特点我們已經能够比較精确地加以說明。那必須是一个由于美国参加而变成可能的政策；这就是說，美国必須答应自己参加非洲問題的解决，作出其他国家所不能作的貢獻，从而把所有的非洲問題提到一个較高的水平上。这种政策在整个世界中，特别是在非洲，必須不削弱英国和法国在美国面前的相对地位。最后，这种政策必須能使非洲各族人民自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立刻向前发展。只有适合这三个要求的政策，才能认为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美国政策。

美国能够貢獻什么，使所有的非洲問題出現新的曙光呢？美国能够担保实现一个大規模的非洲工业化計劃，只要战争一旦結束，美国軍事工业一經开始轉向平时生产，立即予以执行。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够这样作，而在战后能够立即可以利用的这样广大的市場，正是美国战后最迫切的需要之一。

这样一个使非洲工业化的计划将立即提供解决千百个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基础,其中包括最重大的问题。

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利益自然要被投入这样一个工业化计划的熔炉中。英国和法国就它们所牺牲的殖民垄断权利必须得到补偿;但工业化的果实是如此的硕大惊人,这显然是可能的。两国由于放弃它们的殖民权利,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能够增强起来。

归根到底,非洲的工业化,只在非洲人口都被吸引来参加这个过程并分享其利益时,才能成功。它必须使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照他们参加这个工作的情况,得到普遍的和不断的提高。非洲人必须有机会丝毫不受限制地担任经济事业中的每一个位置和职务,直到最高级。全体居民必须从一切封建和殖民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必须为居民大众建立一种教育制度,并使最有资格的人受到专门的技术训练。必须立即施行一种地方自治制度,以非洲的每一民族最后实行完全自决为目标,并定出其完成的时间表。

采取了这些措施,就可以为一个工业化的非洲奠定巩固的基础,这种基础将保证非洲工业化的成功;不采取这些措施,整个计划就将受到内部矛盾和国际矛盾的阻碍,不能实行。一个殖民地的和隶属于他国的人民是不能够建立或维持现代的工业化经济的。

旧的殖民行政制度必须为一种新型的、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所有效地代替,这种组织的建立,是用来创造和维持顺利进行工业化所需要的条件的,它将把政府职能逐步交到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机关手中,最后它自己就不再存在了。

将允许南非联邦参加一般的全洲的工业化,其条件为,它在自己领土内也使非洲土著居民获得那种必要的平等地位,而现

在它是拒絕他們享有这种地位的。

由我看来,这些就是这样一個計劃的主要輪廓,这个計劃是美国,也只有美国,为了所有有关各国人民的利益,能够促使非洲和全世界去实行的。

这个計劃将产生这种无法估計的好处:使非洲不再是国际竞争的角逐場所,并使它变成国际合作的實驗室。它将使一个偉大的和沒有开发的大陆参加到世界进步的主流中来,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和經濟方面。它将为美国和英国开辟另一个这样的广闊市場,这种市場是在战争結束以后立刻需要的,如果要世界不再陷入又一次具有毁灭性的經濟危机,像1929—1933年那样的話。它将在联合国家的大厦中建成另一个强大的支柱,只有联合国家才能使世界免于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威胁。

在社会方面、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同非洲密切相联的是阿拉伯的近东各国,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約旦;主要的不同是,在这个地区,絕大部分的領土和人口已組成民族独立国家,或正在获得独立。这个地区和我們的整个主题有何等深切的关联,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說明:即关于打算用美国錢去装置通到地中海的輸油管計劃在美国引起的刺耳的和不体面的爭論,以及在英国和美国之間关于近东經濟发展各个方面的比較压抑的、比較体面的、然而同样是同样尖銳的分歧。在这里也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地区經濟发展計劃,能够通过国际合作来調和各国之間的竞争。在这里,又提出了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在經濟上参加这样一个計劃的可能性的全部問題。

只有以这样一个关于近东的、为列强所支持而又完全适合有关各族人民的民族願望的經濟計劃为背景,才能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問題得到稳定的解决。这是肃清支

配近东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封建残余的必要基础。

在非洲，也像在其余的世界一样，这样一种战后前景的现实希望会立即加强战争的进行，加速胜利的到来，并减少胜利的代价。它将动员一个大陆的强大力量作为我们的积极的同盟者，而不是听任它成为一大堆困难问题的展览厅。

时机早已成熟，美国应当就这样一种政策作出它的建议，征得其盟邦的同意，并进而采集在把“德黑兰”的精神扩大到全世界各处时自己表现的远见、勇敢和活力所带来的丰富果实。

第八章 在美洲的好邻居

这是一件相当惊人的事：在1944年的头几个星期里，当希特勒在世界其余各处都在被击退时，他却向西半球进攻，单单在美洲占据了新的权力地位。亲纳粹的阴谋家们加强了他们对阿根廷的控制，并进而通过政变夺取玻利维亚。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是：玻利维亚的亲纳粹议会会有理由相信它会为华盛顿所欢迎，因为它的代理人在美国政府中占据有势力的高位，受到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报纸的支持。

没有疑问，曾经定下了计划，向另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扩大这种纳粹的进攻。甚至在墨西哥，臭名远扬的辛那基运动也受到美国天主教会一个高级领袖（他表面上是因宗教使命去到墨西哥）的公开鼓励，去推翻墨西哥政府。

当世界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其余各处面临着失败时，在美洲这半边却能大胆进攻，显然在西半球的好邻居中不是百事大吉。如果不是由于两个人的机警和勇敢的反击，这种进攻还会得到更大的进展；这两个人就是美国国务卿科德耳·赫尔先生和拉

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主席維森特·倫巴多·托列达諾先生。科德耳·赫尔在华盛顿这一端制止了这种阴谋，而倫巴多·托列达諾則通过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蒙地維的亚举行的特別會議，在美国代表团参加之下，集結了所有南方各国的民主和劳工阶层。

法西斯主义对美洲的进攻已經被制止，然而使这种进攻成为可能的情况并未得到改正。这种情况是我們的敌人活动的基础，我們全国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这些情况上，以便制訂政策来改善这种情况。

目前有利于納粹在西半球各国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势具有三个基本特点。这就是：（1）美国对其睦邻政策的不变性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种政策还随我們 1944 年大选的結果如何为轉移；（2）美国未能勇敢地区分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例如，它容忍长枪会，它願意同与納粹維持关系、甚至支持他們当政的那些集团打点小交道，它对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民主和劳工运动采取冷淡的和保留的态度，而后者是美国最可靠的朋友；最后，（3）在英国和美国之間繼續进行斗争，希望在拉丁美洲的战后市場中取得优惠的地位，这种竞争使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問題和每一种力量安排陷入混乱。

我們并不是非要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来混过現在的世界危机不可，因为，只要美国倡导一种正确的政策，它完全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使之变成十分有利。

本章的目的就在指明这样一种政策的主要之点，这种政策会使法西斯敌人遭受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加速战争的胜利，并在我們自己这半个世界上为“德黑兰”的战后前景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

关于第一点，我們的睦邻政策的不变性，我們有力量立即采取这样一种步骤，它既能给予整个拉丁美洲以最深的保证，同时又符合我們自己的最高利益。全部要作的事情是：无条件地宣布美国在原则上承认波多黎各是一个国家，准备经过同波多黎各人民的代表协商作出有关的安排以后，立即承认波多黎各的独立政府。

在整个拉丁美洲，这样一个步骤对于所有亲纳粹的阴谋巢穴会是一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迎头痛击，并且还会进而使对“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普遍恐惧归于消失，上述阴谋即是以这种恐惧心理作为滋养料的。在南方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心目中，波多黎各的命运已经成为美国长期意向的信号。如果波多黎各的两百万人还是美国的“子民”，而他們的土地还是美国的“属地”（伴随这种情况而来的是极端的贫穷，困苦，落后，和前景的一片模糊），那么，大部分美洲人民将把美国的“睦邻政策”看成是一时的权宜之計，用来度过经济危机和受到纳粹与日本威胁的困难时期。

其次，这种步骤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因为它会消除在我們的大門旁边造成我們自己的“爱尔兰”的危险。在今日波多黎各生活的某些派别中，有显明的证据，证明有一种对美国怀抱的顽固的和不讲理的敌视态度产生，同瓦勒拉对英国的态度完全相同，而这同样引导到容忍甚至怀抱法西斯主义。在竭力设法同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集团进行合作时，我自己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发展的严重症候。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不管它可能是多么的錯誤，对它单单加以斥责和镇压，肯定不是美国的解决办法。我們的国家政策的任务，就在于消除产生这类“瓦勒拉”的情况，而且要作得及时。现在就毫不吝惜地给予波多黎各独立，将保证得到一个友好的波多黎各，一个真正的好邻居。

拉丁美洲人对睦邻政策如何反应，他们如何了解反对轴心国的战争的历史意义，从一个著名作家同时是波多黎各爱国者朱安·安多尼沃·科列哲在纽约发行的新报纸《西班牙的乡村》在整个拉丁美洲所产生的深刻的道德影响，可以得到最重大的证明。这个报纸的主要贡献是，它在说明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同联合国家反对轴心国的胜利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处理西半球团结的问题上，表现了清楚的理解和深刻的信心。

关于第二点，区别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朋友和敌人。这依然是事实：美国的官方政策在某些方面加强和鼓励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敌人，同时它使我们的朋友受到挫抑，感到沮丧。美国帮助佛朗哥，他是用武力摧毁西班牙共和国然后在西班牙当政的——我们拒绝履行对西班牙共和国所负的特定条约义务，当佛朗哥靠着希特勒的帮助去到马德里时，我们赶快承认了他；我们在马德里保留一个大使，他公开赞扬佛朗哥的统治，并为他的组织——长枪会辩护。

正是这个长枪会，它在整个拉丁美洲和美国自己的国内作为希特勒的阴谋和间谍网从事活动。陶醉于作为胜利的希特勒主义的代理人而行动的想法，佛朗哥政府近在1940年还“张贴官方的标语，不仅提出对古巴和菲律宾的要求，而且提出对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要求。”^①面临着希特勒可能的失败，它正在挑起每一种对美国的潜在的反，使之从事不顾死活的牵制行动，希望在1944年的选举运动中造成一个主要的危机，从而使罗斯福失败，这是挽救一种通过协商取得的和平以便为法西斯主义保存基础的主要希望。

事实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美国的官方政策仍然不肯把长枪

^① 托马斯·汉密尔顿：“西班牙帝国的迷梦”，《外交》，1944年4月号。

会以及同情它的集团当成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敌人看待，反而坚持把它们当成是不可少的人，必须通过让步和有礼貌的对待，参加它们对正在兴起的民主力量的敌视，把它们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差不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谈，然而又是铁一般的事实：美国对待拉丁美洲各国内部问题的官方态度同我们的直认不諱的死敌——长枪会的态度一般无二，即采取敌视民主集团、特别是劳工运动的政策，后者被认为是“共产党”，因而是“可疑的”。公开的长枪会会员和希特勒的同情者在美国进进出出、自由旅行、很少感到困难，其中一些人还被正式邀请到我们的大学去演讲，被授予“特殊勋劳奖章”，如此等等，而最积极的反法西斯和反长枪会的人士却被列入官方抵制名单，不允许他们来到美国。我们至今仍然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朋友看待，把我们的朋友当作敌人看待。

例如，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事实：美国在古巴的外交和领事人员十分公开地谈论在未来选举中他们对格劳·圣马丁所领导的反对集团的同情，和他们对比蒂斯塔总统所领导的民主集团的厌恶。但这同样是人所共知的：格劳·圣马丁和他的朋友们同长枪会一道工作，为后者所支持。对我们美国的顽固分子来说，比蒂斯塔政府集团是十恶不赦的，因为它包括古巴共产党人，并且在内阁中还有一个共产党人；至于这个民主联盟也是拥护联合国家的，在这些美国人看来却不重要。

华盛顿制造的这种官方政策的最荒唐的例子，是对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主席维森特·伦巴多·托列达诺所进行的报复。这件事走到了这样的极端：美国政府雇用的人员利用他们的职位使一个阴谋具有半官方的色彩，这个阴谋是要取消托列达诺

担任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主席，希望代之以他们自己选定的人——智利的伊巴涅兹。此举未成，他们就要使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分裂，在拉丁美洲另外成立一个受华盛顿支配的新的劳工联合会。在高级人士中以托列达诺是一个“共产党人”为理由庄严地为这一切辩护，这同纽约美国劳工党中杜宾斯基—罗斯—康茨集团把党内的悉尼·希尔曼及其同伴们叫做“共产党人”的方式和证据一模一样。

幸而，至少就托列达诺来说，有日益增加的迹象表明：我们政府的真正领导者们迄今为止已制止他们下属的这种疯狂行为。但在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中，我们还远远未能认清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并把他们区别对待。我们国家在对待我们的邻邦上，还在心理上深深纠缠在希特勒的“反共产国际”宣传的迷网中。

在睦邻关系增长中第三个深刻的扰乱因素，就是英美两国在拉丁美洲方面的日益剧烈的竞争。这个事实使所有研究阿根廷混乱局面的人不得不注意：英美竞争是一个造成损害的因素，其严重性只次于纳粹的渗透和得势。如果不是英国和美国彼此齟齬，那些纳粹代理人是决不会掌握政权的；两国都要求那些亲纳粹的集团依附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只在一点上彼此一致：使真正代表阿根廷人民的民主和劳工集团受到挫抑。

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实，我们对它们假定是要谨慎地保守沉默、避免去公开讨论的。既然这种缄默政策在阿根廷方面遭到了如此严重的失败，也许现在已经是时候，可以用一些公开讨论的清新空气，来把英美在拉丁美洲竞争的整个事态加以澄清，看看这种竞争对一切有关方面的最高利益是何等有害。

英国人耽心他们对拉丁美洲市场的控制会被美国夺去；他

們对美国企图迫使他們将在阿根廷的投資轉让美国以供应他們战时的財政需要一舉，特別表示憤怒。美国的利益集团把拉丁美洲看成是他們自己的特別保留地，在这里他們的英国穷兄弟只是闖进来的外人，必須将其排挤出去，为美国战后大規模的市場擴張让出一条路来。某些拉丁美洲人似乎满足于有两大强国彼此角斗来爭夺他們的归附，而不願只有一个强国，它会以“非取則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条件。

这个三角形的每一个角都幻想当它使竞争更加剧烈时，那就是促进它自己的利益。冷酷的事实是，他們这样一作，只不过是三敗俱伤。英美利益集团是为軸心国阴谋敞開大門，同时是用各种各样的壟断办法限制着总的市場。拉丁美洲人发现，他們的内部政治生活由于各个反动集团在这个或那个强国庇护之下的兴起而受到歪曲，而所有这些集团和强国全都阻碍着他們的經濟发展；但另一方面，缺乏任何一种公认的、有組織的共同利益或計劃就使得有巨大可能性的政治和經濟成就不能实现，这种成就使英国、美国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时得到好处，远远超过在无限制的竞争情况下任何一方单独所能得到的好处。

必須十分坦白地說，改变現存关系的責任完全落在美国肩头。这是責任和权力相連的原則的必然結果。美国不仅是西半球的最有力量的唯一因素，而且也只有它能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的計劃，其規模和范围之大，足以将一切特殊的既得利益包括无遺。

当前的情势所明白要求的是，美国須率先提出一个发展拉丁美洲各国經濟的共同計劃。这个計劃必須立刻設計，并在战后立即执行，其規模之大，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和拉丁美洲的巨大的土地、原料与人力資源相称，和英美供应資本与創造重工业产品市場的能力相称。

为了使这样一个计划变成真正共同的东西，它必须调和这个三角形的每一角的利益。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它必须保证它们的民族独立得到谨慎的保护，同时能使它们的经济福利水平迅速提高，并在每个国家发展一种平衡的经济，避免旧殖民制度下单一经济和极端专业化的坏处。对英美资本来说，它必须提供一个巨大的和可靠的市場，肯定能实现合理的利润和分期还款计划。在英国人和美国人間，必须消除他们的不受约束的竞争，其办法为略为比照他们过去的期望和现在的能力，在共同计划中分配给他们一定的份额。

这样一个计划的全部物质前提无疑是存在的，使它达到随时可以执行的蓝图阶段的技术能力亦复存在。依然缺少的条件，是精神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准备。在详细的蓝图能够制出之前，必须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一个计划对一切有关方面可能造成的好处真是十分巨大的。对拉丁美洲来说，它为一种巨大的向前跃进敞开了大门，这在五年或十年中会超过以往的一个世纪。对英国和美国来说，由于可以利用的市場的空前扩大，这个计划能使它们之间的毁灭性竞争得到调和。特别是对美国，它对那个重要性压倒一切的问题提供了大部分答案，即在战争以后，我们能否在类似战时达到的规模上，使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运转。

对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来说，这要求有一个崭新的思维尺度。我们每年要计划的对拉丁美洲的工业品出口不是几亿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美国所需要的市場，或者说拉丁美洲的发展潜力，不用几十亿美元是不能计算的。

美国如果不能用以笼罩这种伟大前景的广阔的眼界和勇敢的精神去回答这种历史时刻的挑战，那我们国家就得浪费一个世代去寻觅新的道路。

第三編 战后的全国团结

第九章 战时的团结要求战后的团结

如果我们能把战后的问题延缓解决而又能动员美国的全部力量去尽快地赢得战争胜利，那么在想像上这也許是比较好的办法。然而，正像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关于战后世界面貌的某些基本协议已被证明是充分展开联合战争所必需的一样，在美国国内生活中，战后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保持战时全国团结的因素。为了维持美国的战时团结，就要求把这种团结扩展到战后时期。将来的问题在现在已经起作用，要求提前作出某些解决。

要知道这种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可以在这里举几个粗浅的例子。某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在研究它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一个老董事发言，要求经理部门终止它的“绥靖”劳工的政策，解散工会，重新“成为它自己屋子里的主人”。经理回答说，在此战争紧急关头，必须依从公共政策，同工会打交道；但他应允战事一旦结束，“我们一定不再做所有这样的蠢事”。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工会执行委员会也在开会。一个性急的委员要求立即举行罢工运动，就已经积累了多少个月的不平之事采取行动。工会主席答复他：“不，当战争进行中我们不能罢工；但只待战争一停止，你可以相信我是头一个带头来对某某进行一场真正斗争的人。”从这时以后，公司和工会都为一个思想所支配——为战

爭結束之日即將爆發的那場攤牌的鬥爭作好準備。

把這個例子擴大到幾千起，然後追溯這同一原則在充塞我們社會的所有各種矛盾和衝突中是如何發生作用的；這就看得很明白，為什麼在整個美國正在產生一種不可忍受的緊張氣氛，甚至在嚴肅地承認最重要的事情是贏得戰爭勝利的人中間，也是一樣。

除此之外，根據我們美國的憲政制度，1944年又碰到是一個全國選舉年，須選出一個今後四年當政的美國總統，以及全部眾議院議員和三分之一的參議院議員，更不要談許多州和地方的選舉。所有對政府施展壓力的特別利益集團都在警覺地和積極地促進它們自己的目的。所有黨派的和個人的政治野心都被刺激起來，達到狂熱的地步。對他們來說，團結似乎是沒有好處的，只有在選舉中通過傳統的美國式的“打倒他並使他屈服”、自由公開的權力攫奪，才大有好處。

這種情勢似乎是替希特勒在美國的伙伴們預先定制好的。他們竭力設法製造各種各樣的牽制和內部糾紛，以便暗中消除和削弱由於在西歐開辟第二戰場而即將給予希特勒主義的打擊。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美國從德黑蘭聯盟中拉出來，取消決定了希特勒主義滅亡命運的長期聯合和持久和平的前景。他們一定要破壞美國的全國團結，一定要使美國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彼此鬥爭，以便使他們不能把反對希特勒的戰爭進行下去，直到勝利。

在這1944年的春天，這種分裂的勢力在美國已極端狂獷，絲毫不受約束；他們正在欣享着一個真正不可多得的時機。他們威脅着我們的將來和世界的將來。必須制止他們，約束他們。

直接鎮壓美國的分裂勢力，雖然是必要的，但不是控制情勢

的最重要的手段。事实上失败主义者和亲纳粹分子正打算利用这种镇压来增加国内的纷扰和混乱。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在所有真正爱国的美国人中间加强团结和信任的精神。如能作到这点，对故意的分裂分子就能够加以处理，不致造成损害。

赢得战争胜利的考虑就这样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现在就决定把战时的全国团结政策推广到战后时期，在时间上永无限制。从一个长期的持久的和平的“德黑兰”前景来看，也同样有力地要求这样作，因为一个为内部斗争所震撼的美国是不能充分坚持它在战后世界中的英苏美联盟目标的。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最好一开头就把它当做一个很难达到的目的，它将要求我们施展道德方面和智慧方面的全部力量。但同样必要的是：排除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一切失望情绪和宿命主义，充分下定决心，认为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而且一定会解决的。这样来对待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能够找到而且一定会找到行动的路径，只要一貫坚持下去，它就将逐步解决我们的问题。

现在的所谓战后计划大多数与我们提出来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无关，其中许多还是一种障碍，因为它拥护这种或那种争论最大的想法。因此，从这样一条规则出发我们将要看到是最有好处的：我们的战后计划就是以实现在德黑兰所定下的前景为目标的全·国·团·结。

这对所有为计划而计划的人们以及有着图谋特殊利益和目的的计划的人们来说，是不惬意的。可是，我们必须冒着引起他们不快的危险，希望以后取得他们的同情，其办法是帮助他们在更大的团结中找到一个地位，这种团结是他们的计划能为之服务的，但不是他们的计划所能帮助造成的。

美国的全国团结不能建筑在一个预先定好的计划上。这种团结必须通过找出行动中的一致之点，一步一步地达到，这种一致之点要能够调和各个阶级、各个集团和各种倾向彼此互相冲突的观点和利益，它们迄今还是习惯于通过斗争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的。

我们面临的重大危险是：在民主进步的大多数美国人中间，由于各种互相冲突的计划造成的混乱，团结的实现行将受到阻碍，而反动的少数人则将攫得政权，因为他们团结在这个单一目标之下。任何计划如不能在自己背后团结全国有效的多数以促其实现，是分文不值的。

在可能破坏进步民主多数阵营的团结的所有各种分歧中，最不能和解的是在两种前景之间的分歧：一种是美国转到社会主义制度上去的前景，一种是美国将要继续维持它现有的制度而不转到一个根本上崭新的基础上去的前景。

在美国生活中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为基础的行动纲领，现在并不能把一个已有的或可能有的多数团结起来。即使我们把彼此冲突的社会主义概念都堆在一块，其拥护者也只构成一个很小的少数。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地、确实地声明：能够把美国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去拥护“德黑兰”的那种实际可行的计划，将接受现存的经济制度作为其运用的基础和起点。

我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判断是：美国人民在主观上对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任何深刻变化是如此缺乏准备，以致以此为目标的后计划不会使全国团结起来，只会使之进一步分裂。这种计划恰恰会使民主和进步阵营分裂和削弱，同时却会使全国最反动的势力联合起来，更加增强。这种计划的实际效果是：它

們將幫助反“德黑蘭”的勢力在美國當政。

因此，社會主義的信徒們，為了在廣大的民主陣營內作為團結的支持者而積極發生作用，就必須清楚表明：他們決不以危及或削弱這種全國團結的方式和方法去提出社會主義的問題。他們必須在一切實際問題上使他們的社會主義信仰服從於大多數人的共同計劃。

對社會主義的信徒們來說，這個問題決不是一個新問題。自從希特勒在德國當政以後，在集結願意從地球上消除這個威脅的各種力量時，這已經日益成為中心問題。我在1942年夏已經預見到這個問題將以其現在的形式出現，當時我寫道：

“美國如能勝利地經受住這次戰爭的嚴峻考驗，並對勝利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它差不多肯定會作為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重心進入戰後的世界。因此，它在國際大家庭中將起異常重大的作用。

“這個戰後世界的中心問題將是：在聯合國中建立起來的戰時合作在戰後能否繼續和擴大，以便集體處理世界的經濟復興和政治建設問題。所有關於戰後世界的性質的進一步決定，全看對這個問題的答復如何。

“如果作為世界合作中心的聯合國能夠繼續存在並擴大範圍，那就可以期望這樣一種現實的前景：迅速醫治驚人的戰爭創傷，並大踏步地前進，使所有的人民達到‘大西洋憲章’中列舉的在文化上和經濟上獲得提高的目的。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國際戰爭進程中所孕育的、在戰爭結束時即將爆發的騷亂和內戰減少到最低的限度；可以為所有的國家帶來最大程度的和平的和有秩序的發展。”^①

^① 埃爾·白勞德：《勝利和勝利以後》，第251頁，國際出版社，1942年。

我在1942年只能当作一种值得想望的可能性去对待的前景，现在经过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以后，已经变成世界的实际行动纲领，有着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签名。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纲领是现实的和值得想望的，那么，我们的一切计划就将以促其实现为目标。

不管在其他国家的情势如何，在美国，“德黑兰”造成的后果意味着这样一种前景：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以及在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在现存制度的体制内，生产和就业的扩大，民主的加强，——而不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

这就是战争和战后时期美国全国团结计划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因此，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社会主义信徒的政策，就是正视战后世界复兴时期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前景及其一切后果，在这个基础上估计一切的计划，积极地同国内最民主和最进步的多数合作，在一个足够广泛和有效的全国团结中去实现德黑兰的政策。

第十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

我们所研究的美国全国团结，必然而且必须包括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大资本家在内，这些就是对国民经济实行直接的和有效的控制的人。这个事实预先决定了国民经济将在它下面运行的那个计划的许多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美国资本主义及其领袖们的一些特点，就可以把许多问题弄清楚。

首先，最好是对一种造成了许多混乱的似是而非之论加以解释。这种似是而非之论可以表述如下：美国资本主义是世界

上最先进的，但不是最成熟的。它是最先进的，因为它是最强大的，它把生产技术推进到了自己的最高已知点，而它所继承和保留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是最少的。它不是最成熟的，因为它的内部固有的发展趋势还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它还保存着一种年青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在自知和自觉方面还落在后头。

美国资本主义的这种相对不成熟的性质的典型表现是：它紧紧抱住“自由企业”的口号不放，就像野蛮人对他所崇拜的偶像一样。对“自由企业”稍稍表现不尊重的态度，就会比做任何其他事情更快地、更充分地使美国资本家集结成为一个坚固的防卫集团。欧洲的、甚至加拿大的资本家都比较更无动于衷和更现实；在他们的计划思维中所受这个公式的束缚要少得多。但对全体美国资本家来说，“自由企业”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特别是在字面上和理论上，虽然在实践上的背离是可以默许的，如果掩盖这种背离的是一种适度的缄默，或是一种文雅的托辞，说这种背离其实并不是什么背离。

我们自然不能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中接受这种“自由企业”的拜物教。但在我们为包括一大部分美国资本家在内的美国民主多数制订计划的过程中，我们确有必要去充分估计它，并避免对它的正确性进行任何直接的挑战。这个问题有点像宗教自由和宽容的问题，它要求对任何的和一切的宗教信仰与怀抱这种信仰的人表示尊敬的态度，尽管人们没有义务接受其中任何一种作为自己的信仰。

在美国，德黑兰计划的敌人正在捍卫“自由企业”、家庭、母道、宗教和国家主权的口号下集结他们的力量。他们依靠来把资本家集结到他们一边去的口号就是“自由企业”的口号。他

們希望这样来在民主进步陣营中引起混乱，因为对这个陣营的大多数参加者來說，“自由企业”也具有和家庭、母亲同样神圣的性质，他們在母亲怀中吸奶的时候就吸收了这种观念。“自由企业”是資本主义的一个亲密的爱称。既然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我們是具有确信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为了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利益，必須在一个长时期內实行合作，来使資本主义在美国运行，如果我們禁止談論有对它的爱称“自由企业”抱着尊敬的听取态度的必要性，那是相当愚蠢的。因此，我們預先申明我們的諒解：我們所屬的民主进步陣营将实行捍卫“自由企业”，我們把这个名詞作为我国現存的資本主义的一个同义語来理解，我們既不去反对它，也不提出任何相反的口号来。

既然这是圍繞着德黑兰綱領来团結一个有效多数的必要步驟之一，我們就要尽一切力量来在 1944 年的整个选举运动中消除“自由企业”这个不成問題的、引起混乱的問題。

其次，必須注意，某些美国資本家一方面对他們自己的制度的一个較早的时期抱着怀恋（表现在对于“自由企业”这个口号的恋恋不舍上），另一方面他們对进到資本主义經濟形态的任何較高阶段也抱着强烈的憎恶。他們不能区别国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者是他們自己心爱的制度的更强的組織形式，而后者則是廢除資本主义。他們反对前者的激烈程度差不多和反对后者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在 1944 年的选举中，如果民主进步陣营提出一个即使是很溫和的关于銀行、铁路、矿山、公用事业等等归政府所有的計劃，它是不能得到全国拥护的，虽然这种措施会大大促进資本主义的效率，使它更能应付它自己的問題。

战争迫切地要求政府更加有效地干預經濟生活，使之合理

化(这种需要已由下列文件表明：众议院托倫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参议院基戈尔——配珀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由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合在两院提出的法案)，然而即使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也不曾认为在这一方面行使他的权力是适当的，国会也不曾采取行动。即使是总统的温和的防止通货膨胀的“七点计划”亦为国会所拒绝接受，其代价为冒着经常的和破坏性的劳工危机和国民经济中一个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的成长。也许总统这样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一方面任何进一步的压力会使资本家的偏见受到损伤，使他们不满，放松对战争的努力，这对战争带来的损害会比增加经济效率带来的好处更大。

然而，对民主进步多数的有效团结甚至更加危险的是这样一种趋势：某些自由主义的和中等阶级的人士过于拘泥文字地、过于热心地把“自由企业”的口号当成一个行动的口号，并提议付诸实施，作为解散托拉斯和垄断组织及取消卡特尔的纲领。其结果肯定会把所有的资本家投入反动的和失败主义者的阵营，就像否认他们的“自由企业”的口号一样。前者损害他们的物质利益会同后者损害他们的心灵一样地厉害。他们对待他们的“自由企业”，很像他们对待他们的基督教一样——他们不愿它受到怀疑，但那只是为了纪念日和节日，而不是为了在普通工作日的实际应用。因此，民主进步阵营的纲领中任何争取信任的标志，必须在实质上显然是徒具形式而不发生作用的，不仅因为不可能把炒熟了的鸡蛋恢复原形，回到从前的发展阶段中去，还因为当前更实际的理由，即不然的话，资本家将要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它，而面对一个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我们是不可能于1944年选举中取得胜利的。

冷酷的事实是：“自由企业”今天在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资本

在日益扩大的单位中，在托拉斯、联合公司和卡特尔——这些是垄断组织的最高发展——的形式中使自己积聚和集中的自由。

这次战争过去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将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大规模军事生产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操在一百家最大的公司手中，大约有一半是由十个领头的公司生产的。在国民经济的积聚和集中中这种惊人的大踏步前进是不会也不能被取消的，提出并讨论中止这种发展只是空谈家们的事情，只是喜欢听听自己的声音、除了谈谈以外别无他事可做的懒人的事情。

了解资本集中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向大托拉斯和垄断组织所表现的一切发展趋势的自由运用投降。同给予垄断资本以力量的较高技术一道，寄生性的趋势也在发展，它从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牺牲技术进步以加强剥削，以强盗般的掠夺行为吞噬小资本，把自己想像的狭隘的利益驾凌于全国利益之上，如此等等，这种寄生性趋势如不严厉制止，就会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推向更加迅速地重复出现的危机。必须保护小企业并给它们以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托拉斯化资本不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技术进步的那些领域内。

在垄断资本起着统治作用的社会中，要对垄断资本加以调节和限制，不是一件简单的和轻而易举的事。如果大资本联合它的力量来反对社会的其余部分，并为争取不受限制的统治而斗争，那么，倘若不经过一次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和一次会造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现存制度的结果的危机，是否能成功地调节垄断资本是极可怀疑的事。

然而，如果在大资本的行列中有着足够数量的具有眼光和理解的人，他们认识到，如果不使他们自己的制度的运用严格

服从于一个設想广闊和設計明确的从全国和国际上扩大所有的人的幸福の計劃，对这个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种自行毁灭的結局——那么，这些人倘能納入民主进步的人民陣营之内，或者同这个陣营一道工作，就能够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大資本領袖，以最大限度的自己所加的限制去配合最小限度的政府所加的調节，有效地抑制大資本的反社会和反国家的趋势，足以使它参与全国的团結，支持德黑兰計劃。

有着日益增多的证据，证明在大資本的行列中是有着这种有眼光和有理解的人的。只要把下面的事情說明白，他們的人数将要增加，他們的主动性和領導作用将要变得更加强大；存在一种实际可行的綱領，环繞着它，他們能够并且正在同广大的民主进步陣营联合起来，包括有組織的劳工运动在内，这种綱領是促进全国的一般利益的。我們必須大家学会欢迎他們的出現，并在实际生活中证明，以全国团結的精神所作的这种合作的努力，既是可能的，又是有益的。就美国而論，沒有比在劳工和我国民主的自由派方面对大資本行列的人采取一律对待和不加区别的敌視态度更有害于德黑兰前景的了。这只会把那些明智的資本家赶回他們最反动的伙伴的怀抱中去，使美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集团紧紧地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进步。

如果不把能为德黑兰計劃奋斗并在他們整个集团方面至少能贏得某种最小限度参加的大資本家包括在内，在美国就不能造成有效的全国团結，去保证和实现德黑兰計劃。

第十一章 經濟計劃的綱領

政治計劃归根到底必須以經濟为基础，而經濟計劃必須在

一个政治体制内表现出来。生活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极其密切地互相联系着，一方面的任何变化差不多总是会引起另一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为了那些侈谈德黑兰协议的“纯粹政治”性的庸夫俗子们打算，必须把这个浅显的道理重述一下。

美国必须订出一个能适合它作为德黑兰协议主要参加者所起的作用的经济计划。这样一个经济计划不能凭空制订出来，也不能由一个关在屋子里的天才凭着卓越的想像“创造”出来。它必须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经济的现有因素为基础，包括我们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政治制度，并和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它必须找出全国团结中所包括的不同阶级的一个共同利益之点，并从这一点出发来制订。这种方法在各个集团和阶级——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工商业家（工业和金融资本家及其经理们）和劳动阶级（产业工人和农民）——中将赢得最大限度的赞同，引起的反对将减到最低限度。这一点共同利益在公开讨论中已经发现，即各方面所要求的，美国经济在战后时期必须继续充分运行。

这同我国正统的经济思想肯定是背道而驰的。为了认识到这真是一种崭新的想法，值得我们回忆一下，近在1942年，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还采取与此刚刚相反的看法，它声称关于战后经济的一切想法，必须以这个无可辩驳的原理为基础：“国民收入差不多立刻会落到其战时高峰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在1944年，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会为这种论点公开辩护。今天，除了要求保证美国经济在战后时期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的人的声音以外，所有其他的声音都沉寂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能否用很简单的笔墨来在我们面前画出这个问题的主要轮廓，使我们在其详情细节的广阔森林中不致

迷失方向。

根据最低估计，我国国民经济在战后的充分运行意味着，以物品和劳务的生产来计算的国民收入将维持在战时达到的水平上（这在1943年为1,880亿美元，1944年预期将超过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只在军队复员将使可用劳动力的净额增加这个限度内需要加以调整，但可以认为大体上是一个最低的近似值。

中心问题是这个总数中的一部分，即价值850至900亿美元的政府军事定货。战争结束后，这个市场将要骤然地和自动地消失，除非作为一种救济措施，人为地予以延长。因此，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立刻找到平时的货物来代替这种军事市场。所有的思考和设计如果不引向这个中心问题，那就只具有次要的意义。虽然“巴鲁克—汉考克报告”谈到这个经济复原问题的幅度是价值500亿美元的纯粹军用物资，但据我看来，为了我们的目的，必须依市场的性质而不是依货物的性质来决定这个问题的幅度，因为货物的性质只能衡量经济复原的技术问题，而市场的性质——整个军事市场——则可以衡量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代替供军事用途的消费者财货市场时，其经济问题和代替武器与弹药市场完全相同。

这个问题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数量极大。这次战争为美国造成的特别市场，约为1932年我国全部国民收入的两倍。要代替这个特别的军事市场，我们必须找到以前在和平时从未想到过的崭新的市场——约为经济危机达到顶点时整个美国市场两倍之大。

在哪里能找到这个惊人的新市场，又怎样能找到呢？

我们要着手来解决这个规模空前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加强我国战前解决市场问题的方法。很显然，为了实现这个非常

的市場，我們必須尋求非常的方法和方式。

如果我們把問題分成几个主要部分，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潛在市場的两个主要領域——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的一些特点。

由于許多理由，國外市場要求我們首先予以注意。战后世界的头等重大需要，即受到戰爭破坏的各国人民的食物供应和重新安置，和他們被破坏的經濟的复兴，就美国經濟同他們的关系而論，都是对外貿易問題。在我国經濟中，重工业产品、机器等等最迫切需要的銷售市場問題显然必須首先在國外得到滿足，因为戰爭本身給美国带来的，不是像在他国一样的破坏，而是固定資本投資的空前跃进。在工厂生产能力方面，我国經濟将要面临的是相对过剩而不是不足。单只这两个因素，已足以使國外市場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战后經濟前景中占居首要的地位。

在我們必須寻找新市場的大約每年 900 亿美元总数中，必須由國外市場来貢獻多少呢？一提出這個問題，就表明所有流行的关于這個問題的正統想法是极其不适当的。因为看一看对美国战后貿易的一般估計，就发现平均都在四十亿美元左右，最乐观的也不超过每年六十亿美元。

針對这种被傳統束縛的关于這個問題的想法，我毫不迟疑地断言：作为他們的現行制度繼續存在下去的条件，美国的实业家和經濟学家必須把他們的國外市場概念扩大十倍。他們必須开始对最少是四百亿美元而不是流行的平均估計数四十亿美元作出現实的計劃。

在前面討論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各章中，我已竭力对它們在解决美国國外市場問題中能起的作用預先作了一些提示。因此，讓我們在这个时候来看看，我們能否画出一个初步的、大致

的輪廓，当分布到这些新市場以后，美国每年四百亿美元的出口計劃会是怎样。

姑且假定我們的对外貿易計劃将包括世界人口的半数，其分布将大致与人口成比例，那么，每一个有关的地区按人口平均的份額将为 40 美元左右。其次，再假定我国对外貿易包括亚洲和欧洲的各一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全部，以及苏联的一小部分，那么，我国对外貿易額在主要各区的分配大致如下：

拉丁美洲	6,000,000,000 美元
非洲	6,000,000,000
亚洲	20,000,000,000
欧洲	6,000,000,000
苏联	2,000,000,000
新市場共計	40,000,000,000 美元

对这一切，最容易和最明显的答复是：它从头到尾是根据主观假設的，說来容易做起来难。

依照一般接受的經濟思想标准，不难证明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們最后证明这是不可能时，他却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尷尬的境地，他证明了：关于美国战后充分就业的一切希望都是幻想，我国注定要遭受毁灭性的經濟危机，“德黑兰”的希望不能实现，除了追随苏联之后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国家或其余的世界都是沒有前途的。如果美国真是不可能实现类似上述想像的对外貿易数字，那末世界上就只有苏联一个大国能在战后給予它的人民以充分就业。

我們不能靠把更多的負担推到国内市場方面，来使这个问题的国外市場方面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因为当我们这样作时，我們会发现，在所有的正統經濟思想面前，国内市場的扩大甚至更

加困难。

然而，我不能安于对市場問題的失敗主義者的態度，這種態度正是美國經濟學家的特色。由我看來，許多最使他們感到困惑的障礙只存在于或主要是存在于他們的思想方法中；這些障礙是他們自行作出的限制。資本家和他們的經濟學教授們必須作出真正的努力來超脫這些自行扣上的枷鎖，以便使美國經濟不致被投入危機之中。

實現廣大國外市場的需要的最嚴重的障礙，是不許政府在經濟生活中起任何主要作用的教條。一旦承認美國政府在獲得國外市場中應當像它在贏得對外戰爭中一樣起那種勇敢的作用，那末問題看來就會完全不同。

讓我在此重述一遍：我並不是在向“自由企業”和私人創辦企業的制度挑戰。我完全願意幫助自由的私人企業家去實現四百億美元的國外市場，這是由於他們自己選擇的方法而完全需要的。但當他們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們辦不到，那我就拒絕和他們在懸崖邊緣一同策馬，我堅持：如果他們不能用他們自己選擇的方法創造這個市場，他們就必須尋找新的途徑；如果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做，其他的人必須告訴他們怎樣去做。主要之點是，不管用什麼方法，我所指明的那種規模的國外市場必須實現，對美國戰後經濟來說，這個市場是絕對必需的東西。

在私人創辦企業和“自由企業”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限度內，美國政府必須負責來做這件事情，並且要像它在取得戰爭勝利中表現的那樣用全部決心去作。如果“自由企業”不能應付這種挑戰，無法擔負這種任務，政府是能作得到的。

我國政府能分別地同某一國或某幾國的政府合伙創設一系列的大規模實業發展公司，並使之在全世界所有的被破壞地區

和不发达地区內实施铁路和公路建設、农业和工业发展以及全面工业化等等大規模的計劃。美国有熟練的技术人員，他們能在作出决定之后六个月以內提出这种工程的設計圖紙，足以使其立即兴工。一旦美国說清楚所有有关方面将要得到的好处时，在资本主义或殖民地世界沒有一个政府会敢于拒絕参加或敢于退出这种合伙。需用撥款的数量不会比战时已經达到的規模更大，其結果却不是生命和財產的毀灭，而是立刻带来生活的巨大改进，并使新財富的洪流在全世界滾滾流出，不久就会远远超过原有的投資。就全世界的範圍來說，全部規劃能在一个世代的时期內自行得到清償。它們会变成美国資產階級在其全部历史中从来沒有作过的最好的投資。除了金錢的好处——这对美国資本家会是直接的动力——以外，这样一个計劃会提供另一种不可估計的好处：在“德黑兰”所約許的世界中为无数后代获致和平与幸福。

把国内市場的規模扩大到大致同預期的国外市場一样，也必須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做到。这个問題比国外市場問題要困难得多。

首先，在我們資本主义的美国，已經沒有余地可以作出任何巨大的固定資本投資計劃，使生产經濟每年扩大几百亿美元，像我們在国外所預期的那样。战争本身已使我国工厂生产能力扩大到远远超过我們現在看到的市場所能容納的範圍以外——一旦軍事市場不再存在的話。“公共工程”和公路建筑計劃等等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就我們对市場的需要來說，也不过是滄海一粟。在新的固定資本投資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事情，都远远不能弥补由于軍事市場消失以后所留下的漏洞，同时由于会进一步增加生产能力，还将使問題更加严重。

國內市場所受的限制是居民購買力的限制。顯然有一部分居民的購買力是不受財源限制的，因為根據政府專家計算，有770億美元的“游資”存在。^①但擁有這一大筆游資的人們無疑地已經達到他們的消費能力的極限。只有作為投資人來起作用時，他們才能提供額外的市場。擴大已經應有盡有的人們的購買力並不能絲毫擴大國內市場；必要的是擴大那些目前需要多買、也想多買然而力不從心的人的購買力。這些人是不難找到的，因為他們構成美國人的絕大多數。

並不缺少“一般的”購買力，來使國內市場無限制地擴大。唯一的困難是如何刺激現有的購買力，使之活躍起來，因為擁有這種購買力的人由於這種或那種理由，已經失去了他們使之活躍的動力。閑置的購買力，閑置的金錢，是威脅着要扼殺國內市場，從而扼殺我國整個現存經濟制度的因素。購買的願望已和購買的力量分离開來，如果想要使國內市場稍有擴展，就必須使二者再行結合起來。

既然在生產企業中顯然沒有作出國內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投資的余地，——至少是在現有工廠的產品未能找到更穩定的市場以及我們工廠的多余的生产能力沒有被利用以前，生產性的國內投資另外就只有一個可能性。這就是投資在生產的人的因素上，這是一種提高從事生產的居民的質量和能力的投資。有兩個主要的渠道，通過它們能夠作出生產性的投資來提高從事生產的居民的水平；一個是通過政府的大規模的教育、衛生和一般環境改善（包括整個的帶社會保險性質的制度）政策；另一個是更易于為傳統的思想方式所接受的，即採取提高各個生產者

① 參考“參議院文件”第106號，第78屆國會。

的收入的措施，提高的規模要盡量的寬大，大致使习惯于立即將購買力完全用盡的那個居民階層的每年購買力大約增加一倍。

我武斷地把國內市場問題的另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置于考慮之外。那就是，由在手中擁有有效購買力的那個階級將不能用的辦法找到市場的全部剩餘產品購買起來，干脆把它毀掉。從嚴格的經濟觀點看來，這會像戰爭一樣提供一個同樣有效的市場，而其一般的經濟結果亦復相同。但這在政治上會是很危險的，差不多像讓幾千萬人閑着沒有職業一樣的危險，而且會成為醞釀各種各樣的社会和政治騷亂的根源。不，看來似乎更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使美國經濟繼續運行，除非它能找出一個辦法，把它的產品在生產者大眾中更普遍和更慷慨地進行分配。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倫理和政治的範圍，侵入了最切實和最冷酷的經濟學領域。

這個目標，即將那部分會使用其購買力的人口的購買力大約增加一倍，是不能通過“自由企業”的普通運用去達到的，即是說不能靠把各個私人企業家自己作出的決定累積在一起去達到。在這個基礎上來經營，任何私人企業是無利可圖的，除非等到所有的企業都那樣作。只在一般的社会規模上這樣作才有利可圖，但在單獨一個企業跟其他不遵守同一原則的企業競爭時，則顯然無利可圖。因此，這只在作為公共政策而能夠普遍實行，有政府的力量作為後盾時，才能實現。這能够在“自由企業”的形式之下達成，但不能倚靠私人企業家的主動性。

公共政策必須通過它來實施的主要渠道顯然就是提高工資水平，因為在就業的成年人口中，占壓倒多數的是工資勞動者。首先，必須認識到，較高的工資水平並不是勞工運動的特殊利益，而是全體居民的国家利益。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决普遍提高工资水平的任务，这三种办法使用起来都有好处，而它们所引起的創始的困难是最小的。这就是：（1）在所有工业部門中提高規定的最低工资的“基数”；（2）在每一个具体領域中，把所有处在标准以下的工资率提到最高标准，从而实现“同工同酬”的原則；（3）打破工资标准現有的最高限額，其办法为普遍实行年度保证工资和奖励工资的原則，不仅适用于各个产品，而且适用于整个工厂和整个工业部門。这些措施如果在一个“工资署”的领导之下，得到經理上和有机織劳工的合理的合作，用力推行，那么，在推动和刺激全部过程上将会大大发生作用。

关于如何使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加倍的問題，我不打算作出任何詳尽的和全备的答案。只要确定了下述事实，我当前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这对国内市場的扩大是絕對必要的；不扩大国内市場，我們現存的經濟制度就注定要灭亡；因此，这样作是合乎国家利益的，合乎一切階級的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利益的。一旦作为合乎国家利益的全国事务去处理，問題就会在全国共同發揮的聪明才力之下得到解决。

这还只是国内市場問題的開始阶段。为了看到这个問題的主要特点，我們現在也必須注意到：我們的国外市場只能暫時分荷替代軍事市場这个負担的一半，即使我們能够完全实现上述規模的計劃。国外市場暫時地和部分地解决了我們的問題，但只在通过美国国外投資和美国长期貸款来进行的限度內是如此。在这种投資和貸款得到利潤或分期偿还时，还需要用从国外进口貨物的形式来由我們国家接受这种收入。美国实际从国外接受自己对外貿易出口及其所得利潤的付款数目是多少，我們也就必須把国内市場在上述規模以外扩大多少。既然我們的

經濟制度完全系乎对所接受的价值之支付行为之上，国外市場問題不可避免地会和国内市場問題混合在一起，只是延緩支付的条件推迟了一些，又因交易中获得的利潤而使数目大了一些。

那么，从长时期看，代替軍事市場的問題完全是找出办法来使美国人民自己能够消費相当于我国国民經濟生产的全部产品的問題。归根到底，美国人民所能生产的不能比他們所能消費的更多。我們有这样惊人的生产能力，若干年来它阻塞着我們国家的咽喉，有使全国窒息的危險。战争暂时救了我們，使我們不致因多余而悶死，并且进一步扩大了我們的生产能力。归根到底，我国战后經濟問題只不过是：把美国消費的咽喉扩充到同它的生产能力一样大。我們必須做到这点，不然的話——用比尔茲利·腊姆耳先生——不会有人怀疑他对“自由企业”会有任何的顧复意图——的話來說：

“今天大多数工商业者都同意：消灭大量失业是战后时期的首要之急。許多人甚至同意：除非大量失业能够在私人企业經營的制度下得到消除，否則私人企业經營即将为某些其他的关于貨物和劳务的生产与分配的安排所代替。”^①

第十二章 全国团結中的工会

在战争和战后时期，工会是民主政治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也像它是全国团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样。在美国，工会还未获得它們必要的和应有的地位。加强全国团結的工作也包括加强

^① 在美国零售商联合会年会上的演說，1944年2月29日。

工会的工作在内，要进一步联合它们，使它们参加一切公共事务，直到并包括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制订与行政管理。

其所以是这样，因为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稍稍同工会所做的相比拟，使靠工资生活的那一大部分人口——这在美国占绝大多数——能从个人孤立的一筹莫展和政治被动状态中走出来。工会是使工资劳动者变成积极公民的主要工具。工会成长的程度及其参加公共生活的程度，是衡量任何一种民主的生命力的确实尺度。

在美国，在原则上我们是这样承认工会的，但在实际上我们远远落在——例如——英国的后面，更不要谈苏联了，苏联实行一种不同的制度——社会主义，因而不是可以那么直接比较的。

我们必须欢迎资本的领袖们中间所作的每一种这样的表示，即承认必须赋予工会以永久的和日益增长的作用。在许多最重要的例子中，我特别注意到美国商会会长埃里克·约翰斯顿先生的言论。在1943年4月27日的一次演说中，约翰斯顿先生说：

“日益得到承认：劳工组织如果在其组成和管理上具有一种公共责任感时，是能够成为使国家的生产机器更有效率的一种有用的合作因素的。从一种意义来说，劳工正在经历经理上所业已经历的同一成长和适应过程，它能够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约翰斯顿先生近来已把他的这个论点在一次引起广大注意和评论的演说中加以发挥。

约翰斯顿先生表述的最积极方面，在于他把工会和经理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放弃了传统的“从上面看”的态度，后者不幸地使人想起旧日的“主僕关系”，为了反对它，劳工不得不斗争这

么几十年。在約翰斯頓先生的态度中，默认了劳工与經理部門处于平等的地位，如果把这种态度普遍确立起来，就会使我国的全国团结前进一大步。

他着重指出工会的公共責任，对这一点也是不能有任何反对的。一切真誠的劳工領袖，以及工会會員們，已經在日益联合起来，以全国团结为指导，对他們的言論和行动的全部后果担負公共責任。約翰斯頓先生能否证实經理上和資本家过去的言行更要好些的主張，这是极可怀疑的事，但我們决不试图作任何只会激起爭論的比較。工会——只有少数例外，主要是不負責任的約翰·刘易斯及其敬慕者——作出了十分庄严的榜样：面对着雇主們的不可忍受的挑畔、国会的怠工和一些政府机构的許多拙劣行为，仍旧維持不罢工的政策。如果約翰斯頓先生对他那些对待劳工采取不負責任的态度的資本家伙伴們也表示公开反对，那就大有好处了。然而，虽然要作这些批評，我們依然必須強調：劳工們同意約翰斯頓先生的劳工必須負担更大的公共責任的要求，这一点第一流的劳工領袖菲利浦·莫萊已經十分明确地提出教劝并实行了。

和約翰斯頓先生发生爭执的严重可能性是从这里产生的：他把劳工的作用謹慎地限制在“使国家的生产机器更有效率”的範圍內。这是一个重要的作用，但如果約翰斯頓先生对他的表述作狭义的解釋，把劳工也要起积极的政治作用的权利和义务排除在外，那么我們属于劳动陣营的人就必须和他辯个明白了。我們不能接受任何这样的趋势，即对工会的利益和活动两者的範圍所加的限制，超过对全体公民所加的限制以外。

劳工在全国团结(这是在战后世界中必須予以发展的)中所起的作用之所以具有新的特点，是因为对待提高工資标准問題

采取了新的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章已从其一般的经济背景加以叙述。那就是：整个国家必须把提高居民购买力的计划作为它自己的计划，这种计划对大多数人即工资劳动者来说，就意味着提高工资标准。这件事过去主要单单是工会方面的特殊事务，只是有时偶然从政府得到一些帮助，而资本方面通常是反对的；在战后时期这件事却必须变成全国的目标，所有的阶级和组织都要用我们现在进行战争这样的决心去实现它。

设想美国在战后会把工会的中心任务——普遍提高工资标准变成全国共同担负的任务，从而赋予工会以在全国团结中一个新的、高的地位，这果真只是白天作梦吗？

纽约的自由派报纸《下午报》因我讲到这样一种前景而责备我“叛卖”，并且争辩说，美国资本家生来就是这样的反动和愚蠢，除了在一次总的斗争中打败他们以外，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说我是在提议，“有人冲着打你一个耳光，你也不要回手，这样来避免冲突”。其他的人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者，杜宾斯基集团，路德之流，以及约翰·刘易斯。

自然，我不能提供任何保证，说在战后的美国，工会将被给予它应有的地位。我不能肯定地应许任何人，在这次战后不会有一次新的“开放工厂”和“美国计划”运动去粉碎工会，像在1919—1921年发生的情形一样。归根到底，那将由资本家自己去作出这个决定。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劳工必须准备保卫自己。我不是圣雄甘地的信徒，他对邪恶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在劳工队伍中也不会找到真正的皈依者。

然而我坚持这是值得去作的：劳工为了他自己的开明的私利，要对这个问题采取负责的立场；劳工不要被动地、宿命论地

在趋向这种主要冲突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劳工必须把这件事说得清清楚楚，使人毫无疑问，即这种冲突并不是劳工运动的愿望或目的；劳工将公开地尽力之所能及，避免这种冲突。如果一次主要的阶级斗争在战后的美国真是不可避免，使我们的和平和繁荣的希望归于破灭，让这一点在世界面前清楚地确定下来：责任不在劳工，而在劳工的敌人。

依我个人的愚见，这条道路既是避免冲突（如果这是可能的）的最好的办法，又为在斗争（如果这证明是必要的）中取得胜利作好了准备。

能否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资本家集团是在带着这样一种普遍提高工资标准的计划，朝着包括劳工运动在内的全国团结的方向前进，或者能使之朝着这种方向前进呢？

有着大量的这种象征。我只想引证其中之一来作批判的考察，这也是从上面已经援引过的埃里克·约翰斯顿那里得来的。在同一篇演说中我择取下面一段：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生产的艺术。现在还有待于我们来掌握大量分配的艺术，以便使我国雄偉的工业机器的产品可以日益广泛地分配到我们全体人民中去。这不再是一个虔诚的愿望了。这是一个具体的需要。我们已经可以生产出产量空前庞大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为了吸收这样数量庞大的产品，工商业、劳工和农业必须合作来维持充分就业、高工资和最大限度的购买力。”

出自美国商会会长之口，出自“自由企业”和私人创办企业的主要十字军战士之口，这是一个一般的纲领性的目标，跟我从一个劳工领袖那里看到的東西同样好。由我看来，这是够好的了。只是在选择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的方法上，可能同约翰斯

頓先生有不同的意見。

約翰斯頓先生和他的伙伴們說的果然是真心話么？

已經知道的考驗真誠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看行動如何。就讓勞工運動接受約翰斯頓先生的綱領，來考驗一下吧。如果能見諸實行，那就好極了。如若不然，再來採取恐嚇的手段；勞工們這樣作，至少要比不加思索地聽從《下午報》以及其他類似的淺薄見解，在戰略上和道義上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

在我自己，我不猶豫地接受約翰斯頓先生的話，作為他的意圖的真實聲明。

勞工們難于和約翰斯頓先生以及與他有同樣想法的人取得一致的，是關於達成大家同意的目標的方式和方法。但在這一方面，分歧也不一定不能解決的。因為這些有思想的資本家雖然把他們的獨斷主義限制在一般的論斷上，在具體措施問題上卻表現出一種高度的和日益增長的思想靈活性。這可以再引證幾段約翰斯頓先生的話來說明：

“我們中間太多的人把資本主義說成好像是一種絕對的東西——在今天就像在昨天一樣，在明天還會像在今天一樣。我們中間太多的人把競爭說成好像是一種絕對的東西，沒有程度上和深淺上的差別。沒有比這更容易引起誤會和更有害的了。在我們對基本的自由企業概念作熱烈的辯護時，我們必須對這種繼續的演進作理智上的體會。

“只有故意裝作瞎子的人，才看不到原始掠奪時期的舊式資本主義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這種資本主義是靠低工資和在最低限度周轉期中得到最大限度利潤繁榮起來的，它拒絕集體訂約並反對對競爭過程作合理的公共調節。”

在他以前的一次演說中，約翰斯頓先生提出了战后充分生产和就业的必要性，并請求資本家們負起这个責任来，他以如下的警告作結束：“不然的話，政府会那样去作，”他要求“在政府、經理、劳工和农业之間建立一种新的合作秩序”。

在类似約翰斯頓先生所作的这种宣告的基础之上，劳工运动能够很容易达成一个大家同意的实际可行的綱領，它給予資本家最大的主动性去依他們自己选定的方式解决分配問題，如果資本家能够同意在綱領中也包括一种規定，使政府参加进来，去弥补綱領中所留下的任何缺陷。約翰斯頓先生已經表示同意这样作了。他說：“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让美国公民失业了。他們将为工商界所雇用，否則他們就将为政府所雇用。”关于劳工的地位，他說：“我所說的合作，既不是工商界向劳工屈服，也不是劳工向工商界屈服。”

工会运动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能力必須具有信心，以便着手来在这样一种全国团结之內解决自己的問題，一般不求助于试图通过斗争来解决爭执。因为爭执自然还会很多，认为只要同意合作就能解决一切問題，那是极端愚蠢的。剛剛相反，只在某些基本協議开始形成时，真正有意思的事才开始。

劳工要找到自己在全国团结中的适当地位，前途还籠罩着这种漆黑的烏云；我們在战时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成就是如此的不能令人滿意。一般說来，劳工并未被欢迎去参加这次作战的政策决定或行政工作，而工資問題的处理又是令人极不滿意的。虽然劳工对此要負一些責任(主要是由于它的不团结)，主要的事实依然是：資本行列中在找出这些問題的适当答案上表現的抗拒极大，給予的帮助很小。

如果約翰斯頓先生，以及具有和他一样見解的資本代言人

和領袖，真想在战后世界中同劳工保持合作关系，他們就应当采取比迄今远远更为坚决的行动，在現在，在战时，就去实行。因为在劳工进入战后时期时，战时經驗对于他們的心情和态度是有严重影响的。

必須十分坦率和十分尖銳地对政府和工商界所有的領袖們說：劳工一般都感觉到，在这次战争中，資本家对劳工实行了綁票和劫掠；关于全国团结和合作，他們口里說得多；实际做得少；就劳工來說，在战时紀律的压力之下，这实际上是只有接受命令，不能开口，这真有点太不好受了。当战争进行时，工人的爱国心深刻而强烈，可以接受这一切，沒有太多的怨言。可是我們最好能够了解，这样做是在使紧张的情况日益严重，对于战后的有秩序的合作是沒有好处的。

工商界和政府現在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进这种情势。可以和劳工进行更多的严肃的协商。特别是可以做許多事来改进战时对尖銳的工資問題的处理，这会加强作战的努力，在伤亡必然很大的西方戰場即将开辟的时期提高士气，并在許多方面杜絕像約翰·刘易斯及其朋友这一类全国团结破坏者的活动。

战时工資政策的处理，表现了独断主义和僵硬。

劳工們是把自己当作一支生产大軍来行动的。他們感觉到，这支大軍的需求在对軍营中和戰場上的部队作了供应以后，需要作尽可能周到的供应。他們感觉到，使生产大軍在食物、衣服、住宅和社会服务方面感到任何缺乏的唯一合法的理由，是这些东西在国内異常缺乏，不能由于有組織的照顾而得到补救。劳工們感觉到，他們沒有得到用这种精神所作的照顾。这种忽視特別表現在工資政策上。

需要對我們的戰時工資政策加以檢查，並採取措施使工資能跟物價保持某種經常的聯繫；保證不斷地糾正不公平的工資待遇，爭取做到同工同酬；使工資的增加同生產的擴大保持某種合理的和穩定的聯繫。目的應當是在使每一個工人和每一個集團相信：他們並不是在他人的獨斷任性和不假思索地應用一種空白公式之下的犧牲品；政府和經理方面經常在努力把現有的商品和勞務提供出來，使普通接受的公平補償標準大致見諸實行。必須確實表明：這個目標的所以不能達到，乃是由於戰爭造成的短缺，而不是由於組織得不好，政策的僵硬，或缺乏誠意。

如果從這些方面作出認真的努力，勞工隊伍中的不滿就會很少，在勞工、政府和經理部門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會很少。而對於我們用合作的精神面對戰後時期的問題來說，這也是可能有的最好的序幕。

我認為不必重述工會的已經確定的任務，包括組織那些尚未參加工會的人以及為團結而鬥爭。隨着我們在此提出的戰後前景的實現，工會在所有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第十三章 民主和全國團結

許多互相衝突的觀點和利益必須學會如何在妥協的基礎上靠攏起來，以便維持全國的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民主的運用方式。但有一條界線，超過了它妥協是不容許的。這條界線就是基本的民主原則，對這些原則如果也實行讓步，就只能產生虛偽的團結形象，在它後面團結的一切可能性都在遭到破壞。

希特勒並不掩飾他的希望：美國的分裂會使得他能夠戰勝

我們，正像法国的分裂曾使他能够战胜法国一样。

因此，任何全国团结计划的主要部分是用来克服希特勒期望为他效劳的那些分裂因素，这种因素现在已经在起牵制作用，来削弱预期不久即将开辟的第二战场。对于战后时期，在希特勒被消灭以后，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那时候团结是同样必需的。

希特勒用操纵和煽动被他击溃的国家内已经存在的分裂因素的方法，制造他的“第五纵队”。他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是种族优越论和“反共产国际”。

希特勒那些理论的思想线索就像导火线一样，它将使美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埋藏下的地雷爆炸。现在只防止希特勒去使这些地雷爆炸已经不够；我们还必须把从这些地雷上卸下所有的导火线并且清除这些地雷作为我们的任务，使它们以后不致爆炸开来，破坏我们的战后计划。

希特勒的“Herrenvolk”[高等民族]原理，或种族优越论，直接导向美国的三种具有爆炸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根本上是破坏我们的民主的，我们必须毫不妥协地同它们斗争，直到将其消灭为止。这就是：（1）歧视黑人制度[Jim Crowism]，即执意否认美国黑人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种态度也推广到对待其他民族上，例如对美国籍墨西哥人；（2）人头税，即对选举权课税的制度，存在于南方的八个州中，用来剥夺大多数选民的选举权，包括白人和黑人，虽然主要只是用来对付黑人的；（3）反犹太运动[anti-Semitism]，即对美国的犹太人采取敌对、歧视和隔离的制度，其根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现在由于希特勒一类势力的积极培植，在我们的花园中就像野草一般日益滋蔓。

在1943年中间，在美国有一些令人震惊的例子，表明歧视

黑人的政策所造成的情勢具有損害极大的爆炸性。底特律的暴行是最严重的例子，有三十五个黑人被暴徒屠杀在大街上，一个巨大的軍事生产中心被破坏了，整个国家陷入惶惶不安的状态。不久在哈倫又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洛杉磯，接連好多天在大街上到处发生反对墨西哥人的斗争，由于他們的服装式样而把他們嘲弄地称为“穿阻特装的匪徒”。在北部和南部的几百个地方，都发生了小規模的騷乱。据报道，真正有几千起反对穿制服的美国士兵的暴行，就因为他們的皮肤是黑的。直接产生这一切的土壤，是一种在法律上已經确立并得到社会贊成的否认公民具有平等权利的制度，虽然美国宪法在一个特別修正条文(这一条从未实行过)中保证美国全体公民都是平等的。

歧視黑人制度的毒惡的策源地显然是在从前的南方蓄奴地区，在那里“白人优越”的原則是以法律形式表达出来，在文字上和希特勒所曾經用过的同样大胆和无耻。

然而，对这个問題略加研究即可发现，南方蒙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維持他們的类似希特勒的制度，仅仅因为他們从北方，甚至从表面上反对这种制度的人中間得到支持。歧視黑人制度作为一种思想和实际行动的制度，已經从它的南方生长地渗透到全国，使全国受到危險的感染。

我从穩重的、保守的和可尊敬的《紐約时报》——它在美国报纸中也許是声望最高的——的一号找出一个例子，來說明这是如何发生的。1943年8月3日，剛剛在底特律和哈倫的暴行发生以后，这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頗为有力的評論，用下列口号为美国的黑人辯护：“如果因为种族和宗教而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歧視，那就沒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是十分令人敬服的，如果《紐約时报》和它所代表的所有一切集团都能一貫遵行，就会很快地

医好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的全部病症。

但是在《紐約时报》的同一天中，在同一版上，由它的明星作家之一阿瑟·克罗克先生执笔的，却是直接采取反对立場并为整个种族优越論辯护的一篇署名的文章。克罗克先生无条件地为歧視黑人制度辯护，說这只不过是对于“自然界的事实”的承认。他說，所有的麻煩都是由于反对这个制度产生的，他认为这是“两种肤色的政治煽动家們”造成的。他指斥宪法中規定的平等公民权的原則，认为那是“有害的和带破坏性的原則”。他表示意見，美国人中的“大多数”是“坚决反对”給予黑人公民以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他宣称，这个制度不能用政治行动去修改，而只能这样去加以修改，即确实做到那是“在正义之灯的照耀下”执行的。

这个惊人的例子——在《紐約时报》的篇幅中为美国的希特勒种族主义辯护——却很少受到人們的注意，尤其是使人困恼的事。大家假定这是理所当然，是又一个“自然界的事实”。另外那位在同一天中写下“如果因为种族和宗教而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歧視，那就沒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几句話的編輯，并不曾公开地对克罗克先生的文章提出抗議，至今为止也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人这样作。

发生了可怕的怀疑：也許克罗克先生既是社論的作者，又是他那篇署名的文章的作者！也許那篇署名的文章只是大多数听来公平的“正义与平等”呼声背后的真实事物的詳細說明，这种呼声並沒有現在就去求其实现的实际斗争伴随着！

克罗克先生关于歧視黑人制度的立場，正是德国对待反犹太运动的“溫和的”納粹态度的美国翻版。例如，多年来担任希特勒的財政部长的亚耳馬尔·沙赫特博士据說曾为納粹屠杀犹太

人的“过分”表示“悲叹”，他的话很像是阿瑟·克罗克的话的德文翻译。沙赫特博士也解释说，这种“可悲叹的过分”是由于民主的“有害的和带破坏性的原则”所造成的；他把犹太人居住区也看作只是对“自然界的事实”的承认；他也想要使纳粹主义“在正义之灯的照耀下”执行。

正像沙赫特博士的“温和的”反犹太运动只是为纳粹最凶残的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提供一个可敬的面貌一样，克罗克先生的“温和的”歧视黑人制度也只是为在美国城市大街上组织暴行的所有的人、为由于把我国人口十分之一排除在宪法保护之外所造成的美国全国团结中的深刻裂痕提供一块遮羞布。

当人们竟指摘沙赫特博士这位没有罪过的君子和人道主义者对褐衫党的“过分”多少要负一些责任时，他总觉得是被侮辱了。同样，当我们揭露克罗克先生同美国的私加死刑者及德国的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有密切的关系时，他也会抱怨他是被诽谤了。但在两种场合下这都是极端真实的：公开的罪犯从这些“可尊敬的”人们获得了自己犯罪的勇气和力量，这些人为他们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而每一个公开宣扬种族优越论的克罗克就会使千万个人习惯于这种看法，认为它是“正常的”，是可以不加诘难便于接受的。

我们所处理的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我们所处理的是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形式，是战争和战后时期全国团结的经纬，或者是这种团结的破坏。在我们的军事力量中，在我们同战后世界国际大家庭的关系中，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对民主的一种非常粗浅和庸俗的理解是，自己满足于对种族主义的最坏的表现作“人道主义的”否认，但完全没有看到，整个种族优越制度是破坏我们国家的武器，我们必须像歼灭希特勒的军部一样无情

地将其击败。

只有战争的严酷需要，才开始使美国不再自鸣得意地接受种族主义的毒害。由于军事生产中缺乏人力，总统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才不得不着手破除一些对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墨西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雇用和升迁所加的最坏的障碍。由于我们军事参谋人员所肩负的组织两种分开的部队而不是一种部队这个任务繁重得不可忍受，最后才开始在军队中破除歧视黑人制度。我们的一切崇高理想，在沒有受到为生存而作战的严酷逼迫因而加强其力量以前，都是十分软弱无力的。

我们的参谋本部在开始建设我国一千万人的部队时，并未过问部队中已经建立的歧视黑人的传统。它不久就发现，这种隔离办法是建立一支有力部队的最大的、无比的障碍；它使每一个现有的问题翻一番，并且还造成了许多新问题。它使应当成为统一的军事组织分裂为二，而涉及的问题是同军事实践或理论毫无关系的。我国人口中十分之一的黑人并未使我国的军事力量按照这个比例增加，反而使我们的困难增加若干倍。黑人沒有取得士兵的地位，而是取得了“问题”的地位。

使黑人部队担任“劳动兵团”的职务来和所谓低劣相适应，从而赋予隔离制度以职能的基础：这方面的努力只是增加了困难的程度，使之达到沸点。

在特种部队和军官的训练中，战争的需要首先使歧视黑人的制度被打破了。保持两套训练军官的制度是十分愚蠢的，这使歧视黑人制度在战争初期这个作战阶段便已被摺弃。白人优越论的最顽固的辩护者，也不能继续为这个带着破坏性后果的、明显的军事上的愚行辩护。现在长时期来，我们训练特种部队和军官一直是不把白人和黑人分开的，在各方面的效果都非常好。

这是歧视黑人制度的彻底的道义上的失败，因为如果种族优越论还有丝毫基础的话，它首先而且特别会在高级技术训练领域内表现出来。

在两种公民资格——头等的和二等的——的基础上要建设一支有力量的部队，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有二等公民，我们就必须把他们排除在部队之外。一支部队只能在平等公民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我们美国的民主政治原则和道德，过去曾被以它们自己作为理由而拒绝适用于黑人，现在却作为军事需要而重新出现，这样就雪除了自己的耻辱！

同时，由于我国原来违犯了原则，由于它对大部分的黑人部队继续实行歧视，它已经受到了惩罚。占我们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由于自己的人部队中所受的待遇而愤怒到了极点，虽然军官和特种部队的训练情况有所改进，并未能将这种愤怒消除。全国团结已经遭到破坏。我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胜利的代价已经增高。尤其是，由于它的长时期的影响，美国在我们盟邦——其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的心目中已打上了“白人优越论”的烙印，打上了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没有区别的种族主义的烙印。在现时和战后，对美国所加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

人头税法律是从种族主义滋长出来的，后者已扩展到——可能是有计划地，但无论如何是最有效地——剥夺五百万以上白人公民和数目大约相同的黑人公民的选举权，这构成了盛行人头税的南方八州的绝大多数人口。如果宪法是我国的有效法律而不只是善良愿望的宣言，实行人头税各州的任何一个和每一个联邦法院就会对因此被剥夺选举权的任何公民提供直接的

救济，因为这是对宪法的无可掩飾的破坏。然而，联邦各法院所持的立場是，在这一方面宪法的执行要看国会是否已通过特別法律，指定必須这样去作。因此，最簡單的公民民主权利即选举权；对实行人头税各州的絕大多数公民來說，还在等待国会的行动。

我不想在此处多費笔墨来細談人头税这个題目，談它怎样歪曲和破坏了我們整个国内政治生活，它怎样使我們全国处在壟断南方政治权力的相对很小的集团的摆布之下，給予它們的影响和权力远远超过了它們在全国所处的相对地位。我只是想要立刻来談人头税的另一个特点，过去对它的注意比較少，而它却是如此重要，以致牵涉到美国在整个世界中所处的地位。这就是人头税和种族主义同美国在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中、在联合国国家中的威望和领导权的关系。

大多数的国家，以及它們的人口的大多数，都不是白人，而是有色民族。亚洲、太平洋島嶼和非洲几乎完全不是白人，拉丁美洲大体上亦复如此。“白人优越”論对世界的这些大多数人來說，就是他們自己被奴役的象征。在“白人优越”的名义下，他們多少世代以来遭受着难堪的痛苦。日本在太平洋用来反对我們的唯一重大的政治武器，就是主張它是在为反对这种为一切有色民族所畏惧和憎恨的“白人优越”論而斗争。此外，白人人口最多的地区，次于美国的最大的强国——即苏联——已經在絕對平等的制度下使它的白人多数和它的有色民族少数联合起来，并极端鄙視一切种族主义的理論。世界力量的均衡已經不可抗拒地和无条件地使“白人优越”論处于不利的地位。将要締造战后世界的那些力量，絕大多数都是奉行种族和民族平等与人类兄弟友爱的原則的。

在这个偉大的世界运动中，美国有可能参加并且起巨大的领导作用。但当美国继续肩负南方的“白人优越”論及其歧视黑人制度、人头税的一切后果时——特别是当在国会中、在军队中以及在我国的外交人員中，都是由在理論上和在实践中狂热拥护这种主义的人占統治地位时，它就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如果美国想要在这个新世界中起领导作用，它必須着手使所有中了“白人优越”論之毒和在任何方面应对人头税这个半封建制度負責的人退出公共生活，特别是使他們不和联合国家中美国的伙伴們发生任何接触。我們的联合国家伙伴将感到簡直无法同有着这种心理的人共事，也不能信任一个由这一类人领导和統治的国家。

近来遍及美国的反犹太的騷动和无賴行为这种浪潮的恶兆性的升漲，表明美国的公共心理對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多么准备不足，表明歧视黑人心理對我們国家品格的毒害是多么深刻。因为今天在我国表現出来的反犹太运动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直接輸入，来为希特勒對我們的战争服务的，而在这种进攻面前，我們作为一个国家，表現了可怜的笨手笨脚、結結巴巴、困惑和无能。

关于把犹太人当作一群人來敌視、或由于他們的种族和宗教而加以敌視的每一种表現，在今天就是这么一个人的标志，他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按照希特勒的征服世界計劃来行动的。希特勒从过去的廢墟中掘出了这种古老的社会毒素，而美国过去所受这种毒素的影响，除苏联外，可說是最少的。然而当美国在进行摧毁希特勒的战争时，它受到希特勒的代理人所輸入的反犹太运动的影响甚至比被希特勒的奸細統治的一些国家更大。在德国以外，在哪里还发生过这样大規模的对犹太墓地的褻瀆、

对犹太会堂的毁坏、和对犹太人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而进行的无赖的人身攻击呢？这样的事情能在这里发生，美国必须深深地感到羞耻！

“白人优越”论及其后果——扼杀民主的人头税、歧视黑人制度和反犹太运动，以及其他的变种如“反天主教运动”，是对美国的全国团结、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领导权的主要的和破坏性最大的进攻之一。

希特勒的最大的外交胜利之一，是他的“反共产国际”在美国的成功运用，把“赤色恐怖”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提到了统治的地位。将来的历史家将要看到，在美国准备应付世界危机中马丁·戴斯所起的作用，是支配一个大国的政治上的歇斯底里的最丰富和最复杂的例子之一。马丁·戴斯在希特勒的“反共产国际”路线中攫取了武器，使他变得强而有力，足以支配国会和报纸，藐视和诽谤美国总统，向常识的基本原则挑战，并且由于极端荒谬而赢得尊敬。无怪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相信，希特勒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秘密武器”！

毫无疑问，“赤色恐怖”——即对共产党人的畏惧，它为轴心国家的征服世界的企图铺平了道路——在美国差不多是完全和对苏联的恐惧与憎恨混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问其优点和缺点如何，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对现存秩序构成任何的威胁，并且许多年来甚至在它所作的公开声明的语气中也不带威胁的色彩。因为美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赞成我们国家应当和苏联发展友谊和结成同盟，所有对苏联的恐惧和憎恨便都集中到了美国的共产党人身上，认为他们是所谓“一个敌对的外国的代理人”。

既然“赤色恐怖”还决没有消失，十分重要的是要懂得它为

什么能使人相信，它包含什么东西。究竟为什么美国人感到对共产党人比对美国其他小的政治派别（对这些党派的存在总是认为当然的）要害怕一些呢？

让我们回到1938年导致慕尼黑投降的那些有关命运的月份里。那时候“赤色恐怖”的沉重负担是什么？我从自己的贴报簿中找到了完全的答案，那就是头等的给人扣红帽子的人罗伊·霍华德的报系所刊登的一幅漫画。这是从1938年7月2日《纽约世界电讯报》剪来的，著名漫画家罗林·克尔比以这样的形式来描述他的“纯然无耻”^①的概念：埃尔·白劳德站在克里姆林和华盛顿中间，手里摇着苏联和美国的国旗，高呼“为红的、白的和蓝的三呼万岁！”^②

除了应当承认漫画家的歪曲和作画动机的敌意之外，这幅漫画相当正确地说明了我和所有美国共产党人多少年来为它努力的主要东西，即要求美国和苏联建立友谊，结成联盟。在1938年7月，这就足以把鄙视和憎恨招到我们身上，把我们说成是纯然无耻的人。

我们在1938年提议建立现在已经实现的这种联盟，究竟有什么错处呢？这个联盟如果早几年实现，就很可能已经防止了这次战争。

在1944年仍然在掀起这个陈旧的“赤色恐怖”的人，也就暴露了他们是反对英苏美联盟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想要尽快地把它结束。如果他们不再公开这样说，那只是因为此刻是不利于他们这样坦白地作的，所以他们找出了一千个其他理

① 纯然无耻(unmitigated gall)，又可解释为十足的勇气，此处语意双关。
——译者

② 白劳德把这幅漫画在原书封面的背后刊了出来。——译者

由来代替这个真实的理由。他们今天甚至否认有这种动机，可是这种动机依然存在。

把隐藏在“赤色恐怖”后面的真实动机掩盖起来的企图，造成了一些奇异的心理歪曲。可以举本届政府中“反共产国际”这个题目的主要代表人——检察总长比德耳的情况作例子。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在施奈德曼案件中所作的决定，因为这使他的臭名远扬的“布里奇斯决定”完全失去了根据，后者是以最典型的纳粹形式的赤色恐怖为基础的。他坚决拒绝允许把共产党对他的布里奇斯决定的反驳提请法院考虑，要求各法院同意他的裁决，根本不给予这个案件的最重要的一方以申诉的机会。据报道，他在3月5日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对他自己的态度作了如下的奇怪的辩护：

“美国共产党人对于政府在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案件中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深为愤慨的。他们承认不能理解，我们怎么可以和俄国并肩作战，赞扬它的惊人胆略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又反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个国家的传播。可是我们肯定不会反对俄国在它自己伟大的国土上防止美国的政治思想的传播；我们会认为那是俄国自己的事情。……”

“难道俄国会告诉它的人民说，它和美国的联盟也包括它对民主政体下的自由、对自由竞争企业的理论表示忠顺吗？难道俄国会告诉它的人民说，它和大不列颠的联盟也包括它自己要建立一个立宪君主政体吗？自然不会。……那末，在这里并没有矛盾，也不可能有什么矛盾，除非是在共产党人的心中，他们对于我们为统治我们自己的社会所作的决定表示愤慨并且会继续表示愤慨，因为这类决定也可能影

响到他們的有些不明不白的地位。”^①

我要在比德耳先生的哲学、他的法学、他的邏輯学和他的政治学方面来对他进行詰难。我要证明，比德耳先生在他反对美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中不仅仅在和我们发生爭执；他已經从根本上对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所闡明的哲学提出挑战；他已經对最高法院所解釋的美国法律提出挑战；他已經違反了每一个公认的邏輯体系；他已經对美国的根本世界政策提出挑战，使全世界的美国敌人心中感到痛快。我要提出和比德耳相反的論点，那就是：由于共产党人的政治見解而对他們加以迫害，这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所关心的特別事情，就像由于犹太人的宗教而对他們加以迫害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事情、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不仅仅是天主教徒忧心的事情、对黑人公民实行政視不仅仅关系到黑人一样；剛剛相反，这类对少数人的有系統的进攻，每一次都是在否认所有公民均有民主权利，是在歪曲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是在威胁战争的胜利进行。

比德耳先生說，在美国容許那些贊成和怀抱共产党想法的人存在，对美国人來說就意味着失去了我們的“統治我們自己的社会”的权力；那末，根据同一理由，他对于所有贊成不列顛君主国的想法的人也应当驅逐他們出境并取消他們的国籍——但是他沒有这样作。他只是提出要取消共产党人和納粹分子的国籍。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很清楚的——比德耳在他自己的裁決中也作了詳細的說明——比德耳是根据这样的假定行事的：在外国，由共产党領導的和由納粹領導的国家同样是美国的敌人，任何同情二者之一的美国人都是內部的敌人，应当作为敌人对

^① 《紐約时报》，1944年3月6日。

待。他下的“共产党人”的定义是：任何人，不問其在政治上如何，如在1941年6月21日以前曾公开表示对苏联怀抱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并贊成苏美联盟，那他就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在假定：虽然美国現在同苏联結成联盟，虽然德黑兰宣言說明这是一个长期的联盟，然而这种关系不久就会变成一种敌对的关系；而对于那些对苏联长期一貫表示友好的美国人，是不能相信他們会忠于自己的国家的。

比德耳先生这样就破坏了美国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用杰斐逊的話來說：“虽然多数人的意志不論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占优势，这种意志若要是正义的，它必須是合理的；少数人有着他們的平等权利，这是平等的法律所必須加以保护的，而破坏这种平等权利就会是压迫。”按照比德耳先生的意見，如果这个少数是一个共产党的少数，它就沒有平等的权利。

比德耳先生这样就破坏了美国的法律，像最高法院在它关于施奈德曼案件的决定中尖銳地提醒他的一样；这个决定是对比德耳先生反对共产党人一事的唯一明白的判断标准；它推翻了比德耳先生以及追随他的下級法院所作的决定，譴責了他們的理論。

比德耳先生这样就破坏了每一个邏輯体系，因为他用他自己个人的对共产党人的憎恨和偏見代替了合乎理性的論证。他为对美国人的区别对待辯护，理由是：既然如果苏联对于贊揚美国的俄国人区别对待，我們沒有权利反对，那么，对于贊揚苏联的美国人加以区别对待，美国人也是沒有权利反对的；当他假定我們要么就必須迫害共产党人否則就必須实行共产主义时，他違反了邏輯。

比德耳先生声称，我們的盟国苏联实在是我們的根本的和

終生的敵人，因而他破壞了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在也許真的像比德耳先生主張的那樣，蘇聯沒有權利過問比德耳先生如何在美國執行他的職務，但蘇聯作為它自己的情報，肯定是不得不注意到這個事實，即美國的檢察總長在其法律裁決中写下了一個理論：任何美國人所持的見解如和蘇聯領袖們的見解相符，那他在事實上就是他自己國家的叛徒。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國人必須注意到這個事實：他們自己的檢察總長對蘇聯所持的態度，正同使布立特和伯利這兩個名字在全世界臭名遠揚的那種態度相同。比德耳先生同布立特和伯利在私人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親密的朋友，這不是偶然的事。這三位名字都用B字起頭的人，是美國反蘇主義的“三劍客”，他們向美國共產黨人開火只不過是他們向英蘇美聯盟的一種掩護的進攻。

每一個維護杰斐遜（他取消了不名譽的“外國人和陰謀叛亂法”）傳統的美國人，每一個認為最高法院對法律的解釋比比德耳先生的解釋好的美國人，每一個不欣賞在我們的最高司法機關中以蒙昧主義代替邏輯的美國人，每一個要建立“德黑蘭”所保證的長期和平和友誼的美國人，——每一個這樣的美國人必須大家來駁斥我們的所有一切形式的“赤色恐怖”，不問其來自比德耳先生，麥考密克上校，赫斯特，抑或來自希特勒本人。

總結起來：全國團結計劃要求在基本上捍衛民主，多數人有絕對統治權，多數人也有絕對義務保護所有各類少數人，他們加在一起就構成美國人中的大多數。它要求廢除歧視黑人制度，使美國黑人獲得憲法所保證的絕對的平等公民權。它要求廢除人頭稅，以及限制選舉權的所有一切其他的方式。它要求宣布反猶太運動以及所有一切形式的種族優越理論和實踐為非法。

它要求击败新近兴起的“反天主教运动”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纯亚美利加党”运动^①中，曾一度在我国造成了那样的损害。它还要求从美国生活中最后清除希特勒的“反共产国际”和“赤色恐怖”，取消所有旨在反对共产党人的例外立法。

这些就是捍卫民主政治的一些简单的和初步的措施。在这种捍卫民主政治的措施方面如果有所妥协或者予以放棄，那就意味着，当我们在国外从事粉碎纳粹主义时，在国内却实行向它让步。因此，这些要求是美国所有爱国人士共同关怀的事情，是任何全国团结计划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① “纯亚美利加党”运动 (The Know-Nothing movement): 1853 年发生于美国的秘密结社运动，以排除所有外国人及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为目的。——译者

第四編 1944年的选举——贊成 团結还是贊成分裂？

第十四章 党派斗争是昂貴的奢侈品

当全国选举正待举行时，美国进入了战争的最严重的决定时刻，我們的士兵将要第一次大量地参加战斗。

我們是唯一的有着这样一个刚性宪法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須举行选举，不問当时全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也像在許多其他的事情上一样，我們必須迁就现实，但要尽可能的做得好些。我們肯定不能从战争中分出时间来修改我們的宪法，这比进行一次全国选举要繁重得多。

然而也毋庸諱言，必須在今年进行选举一事，对于胜利所要求的全国团結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負担。

如果1944年的选举是在美国通常的不顾一切、任所欲为和不負責任的精神下进行，当作一次疯狂的权力爭夺，那对早日胜利和长期和平的一切希望一定要造成十分悲惨的后果。党派斗争在1944年的选举中如果变成支配一切的精神，那它就是最昂貴的奢侈品，我們无力負担。

因此，美国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次选举运动中，如何去控制和压抑那种危险的、放肆的党派斗争的精神。这就是如何以全国团結的精神来进行全国选举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和非常困難的問題。

我國在 1864 年，在內戰的最後階段，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林肯只是剛剛開始作為克服種種令人傷心的戰時困難的主人而出現；他面臨着國會中一個敵對他的聯合，這種聯合使他自己的政黨陷於分裂，並把所有的特殊利益、偏見、失敗主義、未能實現的貪欲和被挫敗的個人野心結成一個憤怒地反對總統的密集隊伍。他的反對者要求他退出公職，作為任何一種國內和平的代價。林肯必然曾經痛苦地想要聽從反對派的話，回到私生活去；他身體疲憊，精神憂傷，他看到繼續戰鬥的結果，對他自己來說沒有別的，只有無限的痛苦。但他也看得很清楚，他的退休對於全國團結是絲毫沒有裨益的；相反地，他的退休會使南方的反叛者產生新的希望，會增加作戰的困難，會使他自己的政黨處於彼此衝突的野心和利益所造成的大混亂中，因而會嚴重地危害戰爭的整個目的——在歷史前進的道路上維持“聯邦統一”。

林肯不顧他自己個人的利益和意願，決定接受 1864 年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使選舉運動從全國分裂的根源變成了重新團結全國的方法。他承擔了這個任務；不通過黨派鬥爭，超出于黨派界綫之外，但在原則問題上對反對派不作一寸的讓步，來贏得全國的選舉。他把非黨派鬥爭的原則推進到如此之遠，以致用擁護“聯邦統一”的聯盟代替了共和黨，並選定擁護“聯邦統一”的南方人安德魯·約翰遜作為他的副總統候選人，這使所有贊成黨派鬥爭的共和黨人非常憤怒。他對抗了每一種特殊的利益和每一個壓力集團，使它們驚惶失措，這是求得全國團結和全國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他勝利了，他採取了唯一可能勝利的方法，因而也在我國歷史上贏得了特殊的光榮地位。

1944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所面臨的問題，和林肯所面臨的

問題異常相像。

許多讀者只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經开过、选定了它們的总统候选人并且确定了它們的綱領之后，才能看到这本书。我現在提出来討論的东西，到那时必然有一些初看起来会像古代历史一样，今天我国和全世界的前进速度是如此之快。然而依我看来，到九月或十月的时候，使我們回想起在三月終选举問題看来是怎么样，似乎是有一定价值的。

当我执笔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罗斯福是否接受提名。这不是总统自己所能决定的問題。他既不能自己去追求提名，即使在他接受提名后，他也不能积极参加竞选。他肩上負荷的是任何人从来不曾負荷过的最大的重担之一；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残酷战争的危急存亡时刻，他是世界上最大强国的总司令。他知道国家最經受不起他自己扮演一个失败的候选人的角色，他在贏得选举中能够作出的贡献，只是宣布正确的政策，并集中精力于贏得战争的胜利。在他能够下定决心接受提名以前，必須給予他令人相信的证据：全国需要他，全国将要选举他，并不要求他忽視自己的战争責任而去竞选总统。如果他必須去追求这个职位，他就不能接受提名。在1944年，只在人民真正表明——用一句老話來說——“职务在找人”时，罗斯福才能成为候选人。

对于这样的一种发展，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若干年来，罗斯福行使了这样一种主动的領導权，以致在国内，在总统的朋友和敌人中，养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在决定对任何問題作出正确的反应之前，先等待他率先倡議。如果要罗斯福当候选人就必须打破这个习惯，現在率先倡議必須来自下面，而不是来自上面。

也許我們应当考慮一下：既然羅斯福不僅在共和黨內有着那樣惡毒的敵人，就是在他自己黨內也有着那樣惡毒的敵人，在他自己黨內表現了對他的極不忠實，那末，為了求得全國團結，也許最好由他自己宣布退休？

稍稍考慮一下，就會看到，這種道路對於國家是多麼有害。得到的結果不是團結，而是把我們國家拋向無邊無際的派系鬥爭的茫茫大海之中。

沒有羅斯福這個舵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就會變成無法調和的各派所形成的打不開的僵局，從中產生的領導，將類似在1920年控制了變成僵局的共和黨代表大會的“俄亥俄一幫”！

擺脫了羅斯福充當民主黨候選人的壓力之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就會成為政黨政治狂熱表現的大好時機。胡佛—塔夫脫—范登堡—伙會大大得勢，而溫德耳·威爾基的希望就會像俗話所說的地獄中的雪球一樣消逝。即使是杜威，現在是政黨機器的白頭老手，也會發現他的力量無形消失，變為許多派別之一。從這種混亂中產生出來的候選人，將為現在的出人意外的競選者，參議員塔夫脫，甚至是赫伯特·胡佛或范登堡——而且勝利的希望是很大的！

如果羅斯福總統退出選舉時，必然的結果大致將會如此。

由於早在1943年夏就已經承認這些事實，於是勞工運動中最有遠見的派別當時便提出了大家歡迎的要求：讓羅斯福當1944年的總統候選人。這在勞工方面並不是一種狹隘的、黨派性的態度，因為由於進行戰爭，它所感受的不平之事是十分急迫的，而各種各樣的煽動家又向它求助，他們允許它得到心之所欲的一切東西，把這些東西包在透明的玻璃紙里，打上一根藍帶！不，這表明了勞工能夠負起它作為全國團結的支柱和代表的責

任。劳工正确地理解到，这不是让罗斯福个人去作决定的問題，这是一个为国家服务的問題，国家提出了要求，个人便必須承担国家需要他担任的职位。

人民必須为罗斯福竞选。这次选举运动应当是不进行党派斗争的运动。它应当是一次爭取全国团结的运动，为了赢得战争，为了实现德黑兰的长期持久和平的前景。决不能让这次选举运动落在旧的政治机器手中，它只知道如何按照旧傳統去进行竞选：刺耳地詈罵对方，对一群职业的政治活动家怀抱狂烈的党派心理。这次选举运动不应挑起和加剧陈旧的派別分歧和偏見，应当超越它們，使之归于消失，并把爱国的公民团结起来，打破陈旧的傳統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分界綫，打破明显的阶级区分的意識形态，打破“旧政与新政”的宿仇，打破实现全国团结途中一切其他的障碍。

我国所处的非常紧急的局面，要求用非常的方式来进行1944年的选举，以便使这次选举从对全国团结的威胁变成在更高的水平上把我国团结起来的手段。

要达到这个目的，人民群众就必须学会如何使极端的党派斗争对表现这种精神的人来说无利可图。人民群众必須找出办法来打倒大声叫嚷的煽动家，揭露一切阴谋詭計，使掌握旧式政治机器的政治活动家退到后台去，开始提出一种新型的领导。

为了这个目的，人民，特别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即“劳工”，必須建立他們自己的从事政治行动的組織，先从近邻和区起，扩大到县、鎮和市，扩大到州和全国。这种組織須是非党派性的，就問題提出主張，对人和候选人的判断，要看他們对这些問題的主張是否明白和直率，而不去评价他們所插的政治党派的标签。

占大多数的独立公民必須組織起来，使民主党和共和党的

政治机器处于从属的地位，因为这些陈旧的机器本身已经变成一种既得利益，脱离人民，没有一个人民所能信赖的。

遵从这些路线，人民能够最有效地影响那两个大规模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们将要选定两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征用罗斯福作为候选人之后，他们就确有把握地使失败主义者和反动派不能控制民主党代表大会。从而他们也就确有把握，至少使失败主义者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不能为所欲为。他们能够从国会中清除两党的不负责任的分子和失败主义者，这些人曾经伙同一起反对总统和他的争取胜利与持久和平的计划；他们能够在两党中提拔出新的更好的人民代表来，这些人将恢复国会的威信，使国会团结起来，作为团结一致的人民代表。

德黑兰计划的命运决定于1944年的选举。所有愿意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的人，不管以前的分歧和矛盾是怎样，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那些对于这个争取胜利和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世界的计划表示反对、从事暗中破坏或有所怀疑的人。

第十五章 我们应当反对谁？

超出政党分界线以外的、不带党派色彩的争取全国团结的斗争，归根到底依然是赞成和反对某些候选人的斗争。我们怎样来认识，谁是我们应当反对的人呢？

让我们立刻开出姓名和地址，就我们必须反对的那类人举一些显著的例子。

在国会的民主党方面，蒙大拿的参议员惠勒和得克萨斯的众议员戴斯是头号例子。在更为众多的共和党例子中，俄亥俄

的參議員塔夫脫和伊利諾的眾議員杰西·薩姆納是我們应当選擇的典型的一對。

他們是對英蘇美聯盟和德黑蘭協議深懷敵意的人。他們總是覺得美國應當和希特勒達成某種妥協，我們能夠有利地同他“打交道”。他們下定決心，如果他們能夠破壞時，就不讓我們和蘇聯“打交道”，並且他們只願意按照他們定下的條件去和英國發生關係，這種條件包括英美聯合反對蘇聯。馬丁·戴斯長時期來就是希特勒的“反共產國際”在美國的主要代理人。杰西·薩姆納曾在國會提出決議案，要求取消英美侵入西歐。他們都是激烈的大聲叫嚷“赤色威脅”的人。他們在國會中都投票去挫敗總統軍事計劃的關鍵性措施。他們都認為羅斯福的“專政”是對美國和對全世界的最大威脅。

把鑒認進一步推廣：他們是南方贊成人頭稅的民主黨人和北方的一些共和黨人，他們在國會中聯合起來拒絕我國士兵在1944年選舉中有通過“聯邦政府投票”——這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辦法——來實行的選舉權，而代之以一種欺騙的措施，這將取消十分之九的武裝部队的選舉權。

在新聞界，這個希特勒主義的朋友們組成的陣營的突出的代表是：麥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論壇報》，J. M. 派特遜的紐約《每日新聞》，“錫西”·派特遜的華盛頓《時代先驅報》，以及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整個報系。這些是最壞的，但必須指出，它們的毒素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滲透了全國大多數的大城市日報。它們是林肯在他那時候必須對付的“柯柏赫報紙”^①的現代翻版，林肯有時候覺得必須用軍事權威去加以鎮壓。它們是陰

^① 柯柏赫報紙 (Copperhead Press)：美國南北戰爭時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報紙。——譯者

謀叛亂和失敗主義的承辦人。

當溫德耳·威爾基在威斯康辛進行預選運動時，他宣稱：他以樹立麥考密克上校和赫斯特作為自己的敵人而自豪；如果共和黨指定這兩個寶貝所能接受的人作總統候選人時，它肯定是要失敗，也是應當失敗的——威爾基在這裡表現了根本上健康的美國人的天性。只要威爾基毫不妥協地堅持這種路線，並以自己不能得到麥考密克和赫斯特的支持而使這種路線達到其邏輯的結局，那他就必須算作是全國團結陣營中的人，不管他在其他問題上可能有什麼錯誤。對麥考密克和赫斯特來說，除了威爾基的名字外，其他提作共和黨候選人的名字都是可以接受的。

失敗主義者陣營的喪心病狂的一翼，表現在杰勒耳德·史密斯（屬於“美國第一”和三K黨組織）和他的新朋友——宗教界法西斯分子科格林神父和柯倫神父所領導的那些組織。它們是“突擊隊”的變種，公開進行希特勒式的騷擾，採取它的一切形式，掩蓋得也最少。只要看誰是他們的朋友，就容易找出失敗主義陣營的更多的潛伏代表人物，把他們加入我們必須反對的名單中去。

在勞工運動內部，失敗主義和納粹一類思想的主要代表人是約翰·劉易斯，聯合礦工協會的頭子。劉易斯是勞工隊伍中“第五縱隊”的總司令。美國的作戰努力在1943年所經歷的最嚴重挫敗，是要由劉易斯負責的。他在礦工們的不平之事上操縱，使之不能和平解決（本來是完全可以和平解決的），實行了一系列不必要的和破壞性的罷工。這對於勞工事業所造成的損害之大，僅次於對戰爭的努力、對國民道德所造成的損害，僅次於它對希特勒所給予的鼓勵。

我們決不可忘記1943年劉易斯給我們的經驗，因為他在

1944年的选举中正准备作为“劳工代言人”出现，企图再一次来破坏团结，帮助失败主义阵营和帮助取得协商的和平。因此，回忆一下1943年同刘易斯进行斗争的基本问题，现在是适时的。

关键性的问题是劳工同战争的关系。刘易斯主张劳工对战争没有基本的政策，他的主张在一个时候获得了具有威胁性的大量拥护。他争辩说，不罢工政策只是对雇主们和政府的让步，只有他刘易斯如果觉得这样作方便时，才能支持它——这就是说，赢得战争是雇主们和政府的目的，实际不是劳工本身的事情，劳工心中另外有别的事情。这种立场主要是一种失败主义的立场；因为，如果劳工不懂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不把战争当作自己的事情，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果，劳工必定把战争的困难和牺牲看作是违反它的意志加在它身上的毫无意义的负担，因此战争是劳工应当反对的东西，要加以抵抗，加以破坏，不管胜利与否，使之结束。而这就是约翰·刘易斯所做过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的逻辑，也是他在1944年选举中将要做的事情的逻辑。

劳工支援战争，是因为它知道，只有胜利，才能使劳工在我国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奴役。如果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所破坏，那就不可能在战争中获胜。因此，工会运动以此作为其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作为对他人的让步：在战争紧急期间，不使用它的自然的和合法的武器，罢工。即使政府是反劳工的，只要它进行战争以取得胜利，劳工也不得不遵循这个政策；但既然反劳工的力量只控制了国会，而行政部门——战时政府中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肯定对劳工是友好的并且是和劳工联合的，那末执行这个政策就要容易得多了。

刘易斯的失败主义的和反战的政策，远远未能做到牺牲战争以促进矿工的利益，它实际上是既违反矿工的利益又反对战

爭的。政府在1942年所提出的政策为刘易斯和矿主們所拒絕，那种政策实质上是和在1943年进行几次有害的罢工之后最后采取的政策完全相同的，而刘易斯却說后者是一种胜利。如果这是胜利，那是在一年以前由刘易斯本人拒絕給予矿工們的！但刘易斯的主要目的是罢工，他所认为胜利的，是他在制造罢工上得到了成功，并不是指的矿工們得到的东西，因为他們可以不必罢工而更早地得到这些东西。

刘易斯和目光短淺而又貪婪的煤矿主們串通一气来行动，后者利用他来破坏政府的物价管制措施和利潤限制。在最具破坏性的罢工正在进行中，刘易斯从他假定是以罢工来对付的雇主方面得到了最热烈的公开贊同。反动矿业資本的代言人《旋轉通訊报》在1943年6月1日一号中写道：

“在我們方面，我們宁願看到是約翰·刘易斯而不是任何別的人当美国劳工的領袖。他的魄力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认为他不但是最强有力的而且是最可靠的国内劳工領袖。”

所有国内失敗主义的和亲納粹的报纸都集結起来支持刘易斯。它們把他当成“劳工的英雄”，把他捧上了天。《芝加哥論壇报》是劳工和战争的死敌，它对刘易斯非常滿意：劳工全体受到了打击，那些贊揚刘易斯的报纸也挑起武装部队因为刘易斯的罢工而产生的对劳工憎恨，在国会通过了反劳工的立法，使整个情势更为困难。

当約翰·刘易斯走向1944年的选举运动，作为一个“劳工領袖”来繼續他的工作时，讓我們提醒劳工运动和整个国家注意一下这些事实。

劳工运动中所有一切不健康的和带破坏性的势力都被吸引

到了約翰·刘易斯的周圍。正是妇女服装工人协会主席戴維·杜宾斯基提議让刘易斯回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去，而胡佛的朋友沃尔和赫彻森則积极加以贊助，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杜宾斯基和刘易斯之間有着自然的吸引力，虽然当刘易斯领导产业工人联合会时，杜宾斯基背棄了他，虽然刘易斯所抱的反犹太主义是臭名远揚的；这种吸引力就是对战争的共同看法。杜宾斯基是直认不諱的抱着和苏联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并且公开表示希望美国帮助摧毁苏联政府。他的朋友錢宁在1942年1月作了如次的声明；杜宾斯基在1943年4月公开表示贊同：

“最后一枪还没有打。那一枪还是要打的。最后一枪将从自由的美国打出——从这一枪斯大林的制度也就会被打得粉碎。”^①

所有怀抱把“斯大林的制度”“打得粉碎”的强烈野心的人，必然会去同在这一方面作最大努力的希特勒制度结成联盟。这就是为什么杜宾斯基及其环绕在《犹太人前进日报》和《新领袖》周圍的政治集团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因为它也想要把斯大林制度“打得粉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拥护南斯拉夫的米哈洛維奇，而誹謗铁托为“共产党匪徒”；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认为科德耳·赫尔是在反对苏联时，就把他捧上了天，而当他领导締結莫斯科协定时，就变成了他的死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德黑兰”憤怒如狂；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問題上他们都在进行反对罗斯福。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劳工党内真正拥护总统的希耳曼势力在预选会上获胜，并选出了它的“国家委员会”这个控制机构时，他们由于盲目的憤怒，就想要分裂美国劳工党。

^① “工人集团”刊物，《朋友》，第33卷，第1期，1942年1月。

勾画了一个在1944年痛恨苏联的人，你也就可以找到一个痛恨英国的人，一个已经站在背叛美国边缘的人。这是另一个很好的指南，可以用来找出在1944年的选举运动中必须加以反对的人。

是的，有着许许多多的国内敌人，举不胜举。

但是我们必须提防，不要根据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资本家、垄断资本家等等陈旧的标签来判定谁是我们的敌人。在所有这些类型中，既有朋友，也有敌人，如果我们向整个一群进攻，就只会加强我们的敌人，削弱我们的朋友。而且这也忽视了存在这样的敌人，他们披着“劳工”的外衣，但和本身是一个“资本家”的那种敌人同样的恶毒和不可和解。

1944年选举运动的号令可以从我国独立战争的传统中得来：“在你看到他们的白眼珠以前，不要开枪。”在你拨动枪机之前，要看清楚你的枪前确实有一个真正的敌人。不要对空中乱放枪。在美国这次战争中，我们要对着正确的目标确实地、稳当地瞄准。

第十六章 共产主义组织的改变

我国组织起来了的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德黑兰协议所开辟的前景和提出的任务是如此带根本性，如此之新，以致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要求在我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作某些重大的改变。最后决定尚有待于在五月间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讨论已经表明了这样一致的意見，将要作出的决定的主要轮廓可以事先明确地加以表述。

美国共产主义者将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放棄为促进作为单独一个集团的本身党派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个政党的主要特征。共产主义者預見到，他們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因此，我們的政治行动将溶合在这种更大的运动之中。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独立政党的存在再不适合实际的目的了，反而会成为达到更大团结的阻碍。

因此，共产主义者要解散他們独立的政党，并找出一个新的和不同的組織形式和名称，更确切地适应当前的任务以及必須通过它来实现这些任务的政治結構。

在美国将不再有共产党了。

一向大叫大嚷要求共产党应当解散的人，現在看到他們的要求将要实现，却感到出奇地失望；他們現在說，这样作一点也沒有区别，既然还会有共产主义者，而他們将用另一种形式自由地联合起来，从事共同的工作。显然，这些人过去所要求的，以及現在还在要求的，是共产主义者应当自杀！有一位康茨博士，他仅仅在几个月前还刊行了一整本书来证明共产党应当解散，現在忽然改变了他的主意，沒有作任何的解釋；他同样大叫大嚷地要求，不管共产主义者願意不願意，他們一定得有自己的独立的党！也許，如果历史不曾这样提供它自己的喜剧性的慰借，那就未免过于严肃，非人性所能堪了。

自然，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将要有一个組織。但那将是非党派性的。

我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道怀抱的政治目的，我們要試圖通过我国現有的政党結構去促进，这現有的政党結構主要是美国特有的“两党制”。

在我 1942 年刊行的《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中，我曾詳細分析两党制及其运用。我曾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变成了半官方的組織，为法律和习惯所保护，使新的主要政党的兴起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美国政治生活中复杂的和永远在变化的潮流都被納入这种傳統形式之中，这些形式是在以往的时期內形成并且是为了适应現在早已过时的問題和政治关系的。結果是，今天的政治問題不是在这两个政党之間，而是在这两个政党之內去决定雌雄的。政党的参加人是由于傳統而不是由于一个共同的当前的一致看法联系到一起的，有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人口，現在占三分之一以上，认为他們是独立于两党之外的，他們在两者之間作出选择时，不是一个总的选择，而是就提出来要作决定的每一个职位和每一个問題来重新作出选择。

沒有人还能够預言哪一个党在国内居于多数，因为沒有一个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穩定多数的。独立的选举人“分散他們的选票”，并不是完全和某个政党一致，这样的人日益变得具有举足輕重的力量。他們的作用由于实行“直接預选”制而更为加强了，在实行这种制度时，許多州的政府自己进行政党領袖和公职候选人的选举，任何公民均可参加（有时候在某一党登記，在其他場合下就只在他进入选場后，才选定他所要用的选票）。

我們不必去辯論这个問題：这是不是可能有的最好的选举制度。这就是我們所有的选举制度，最近看不出有作任何根本改变的希望。我們的任务就是尽力所能及，使它的运用合乎全国的利益。

在現代，有过几次雄心勃勃的嘗試，要打破这种两党制的政治束縛，这是当这种制度过于明显地和过于剧烈地歪曲国内政治关系的时候。这种嘗試就是 1912 年的泰底·罗斯福的“公

鹿”运动^①和1924年的拉弗勒特运动^②。这些反抗行为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并曾促使在两党制的实践上作出许多修正，但它们在组织上并不是成功的，对两党制并未作出永久性的重大改变。

明尼苏达的“农民劳工党”从该州的民主党分裂出去，曾有过一段成功的然而却是短促的生涯；但在1944年，该党几乎全体一致决定再度合并于传统的民主党内，因为发现在他们州中，三党制度的复杂机构是团结的障碍。威斯康辛的“进步党”经历了一段颇为短促的成功生活，但不久就在菲耳·拉弗勒特的模仿纳粹的领导之下解体了。

在纽约，“美国劳工党”能够兴起，产生重大的作用，是因为纽约州的选举法同大多数其他州的不同，允许打破两党界限，就某一个职位提出共同的候选人，最后计算时，把在两种选票上所得的票数加到一起。因此，美国劳工党能够在全国选举中同民主党保持联盟，在本州某些职位的选举中同共和党保持联盟，而在其他职位的选举中则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从而为独立选举人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组织武器。然而它的处境是多么不稳定，可以从一次事件中看得出来，就是当在阿尔巴尼提出了一个法案要修改州选举法律，禁止把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列在不只一种选票上，即只能列在他所登记的那个政党的选票上的时候。这个法案没有通过，但如果立法机关中的共和党多数曾认为这是

① “公鹿”运动(“Bull Moose” movement)：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与共和党分离，曾组织进步党，党员别号“公鹿”。——译者

② 拉弗勒特运动(La Follette movement)：拉弗勒特和康明斯等曾于1924年组织进步党，后来西奥多·罗斯福担任了这个党的领袖，但在总统竞选中未能当选。——译者

完全合乎他們利益的，那就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把它變成法律，从而使美國勞工黨不能像它現在運用得那麼有效。這樣，美國勞工黨就永遠處在控制州立法機關的任何其他政黨的威脅之下。

共產主義者不是作為一個集團或一個組織去參加任何現存的政黨。他們是參加到這樣一群獨立的選舉人中去，這群人從所有各黨提出的候選人中選定最好的人。各個共產主義者有自由去在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政黨名稱下登記，採取他們習慣地與之聯系的獨立進步人士可能認為是最好的方式。

共產主義者為進行他們共同的非政黨活動而建立的新組織，將接收並繼續共產黨過去所進行的所有一切政治教育活動，拋棄政黨選舉的性質，那是體現促進黨派利益的鬥爭的。

新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名稱，在本書付印時尚未商定。大家同意，名稱將為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之類。將要考慮的另外一個提法是非黨政治協會。這兩個名稱之間的問題是：“共產主義”一詞是否應當繼續採用。這是一個怎樣最為方便的問題：在它的名稱上強調這個組織的長期的政治性質好呢，還是強調它和美國人民中廣大的民主進步多數一同工作的方法好。無論如何，美國公眾將毫無疑問地知道：在我國，誰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想些什麼，他們在哪裡，以及他們在做些什麼。從來沒有聽說過，共產主義者是會習慣地或有意地消散得無影無蹤的人。

在某些方面曾經有一種誤解，認為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和工作方法的改變會意味着，嗣後不會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參加競選。共產主義者不會這樣，正像我們將要與之一道共同努力的獨立人士不會這樣一般。然而，這意味着共產主義者不會僅僅作為他們自己一個集團的被提名者，根據一個純粹的共產主義者綱領來競選。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被提名為某種職務的候選人，那

將是由廣大階層的獨立選舉人提名的，就像小本杰明·戴維斯
和彼得·卡其昂被提名為紐約市議會議員的候選人一樣，在此
種情況下，候選人所代表的團結的範圍，比只是一兩張候選人全
都列名的選票所代表的要大得多。當一個共產主義者能夠通過
接受提名來適當地代表並促進這種更大的團結時，他會毫不躊
躇地參加競選。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和工作方法改變的整個問題
總結如下：其所以要這樣作，是受一個思想的支配——使共產主
義者成為美國工人階級和全國團結的更積極更有效的參加者，
為了進步和啟迪、為了戰爭的勝利和為了繁榮與自由的持久和
平而鬥爭。

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以及根據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驗，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者對我們自己的國家，美國，將要作出一種
偉大的和日益增長的貢獻。

第十七章 馬克思主義對美國的貢獻

許多別有用心的人評論家把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正要採取的政
策解釋為放棄馬克思主義。在過去最敵視馬克思主義的人現在
也奔來捍衛它，反對馬克思主義者“背叛”他們自己的主義。甚
至莊嚴持重的老牌《紐約時報》都說，它對背叛了他們自己的教
義的共產主義者，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信心。

這些以往對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曾經——至少說——可悲地
予以忽視的人，現在卻這樣對它表示傷心的關切，真是十分有趣
的事。這值得共產主義者作個答復。

美國共產主義者現有的政策的目標，是在一心一意地解決

美国在有史以来的主要危机中的問題。这种政策必須主要从这个观点来討論。如果它对·这个目的能够有真正的貢獻，那它就是正确的，如果它对·这个目的不能有真正的貢獻，那它就是不正确的。

既然本书已經就世界的形势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处境說明了我們的政策的优点，我們就能够对这个問題作最后的答复：“馬克思主义对美国能有什么貢獻？”在答复这个問題时，也就答复了那些說馬克思主义已經被放棄的人。

馬克思主义就是应用科学来解决政治問題。它把这些問題当作整个历史过程的具体之点来处理，它认为整个历史过程是遵循可以观察、可以表述和可以理解的某些发展原理和某些运动規律的。在对历史原理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更好地武装人类去控制和指导今天正在形成的历史，对我们來說，这种历史就是由美国就我們现有的全国問題所作的决定形成的。如果馬克思主义真是这样一种意义的科学，那它今天就必須首先正确地答复战争所提出的問題。

最近有位先生对我說：“我可以理解你們的政策是专为取得战争胜利而制訂的，但我不理解，执行这种政策的結果，馬克思主义变成怎样了？”我回答他說，我很高兴他能理解为取得战争胜利所必須做的是什麼，但我很遺憾，他把馬克思主义誤解为一种如何使战争失败的理論。

对美国來說，馬克思主义今天首先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指南。既然胜利对美国人民是最高的需要，馬克思主义能否站得住脚，就要看它对胜利的貢獻如何。如果馬克思主义对胜利不曾有所帮助，如果它甚至是取得胜利的障碍，那末我們誠然可以問：“馬克思主义变成怎样了？”但是，如果馬克思主义证明是能

提供最大的帮助的，那它就经过了最大的考验，它有远大的前途，我们不必为之忧虑。

在本书中为美国提出的计划，是马克思主义训练和思想的产物；这个计划从头到尾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的。如果这个计划是健全的，那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就其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意义来说，它是“正统”的。

自然这也是实在的，即就其不是重述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的不同历史情况下所使用的陈旧政策和公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不，这是空前未有的，因而不是正统的。但是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空前未有的形势之下，那就必然要得出结论：为应付这种形势所采取的在科学上正确的政策，必然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是正统的，即是说是按照一个已有的模型制订出来的，那就会证明它是错误的；如果它是空前未有的，那意味着它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策究竟是不是正确，必须联系我们所看到的形势来考察它的优点何在，然后才能证明。而最后的证明必须从行动中、从它是否能成功地应用于生活中去找。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在指导空前未有的行动计划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套教条，而所有想要把它变成教条的人都在试图摧毁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本人在对他的某些信徒生气的时候，曾经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只就“正统的”形势定出正统的计划。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是那些空前未有的时刻，对于这种时刻，正统计划就意味着失败。

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常

常是首先承认并正确地估計一种新的形势的人。

馬克思主义必須对美国思想作出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帮助它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縛。在我作这个声明时，完全意識到大多数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将会对之嘲弄，因为我們的自由主义者相信，是他們有着自由的心胸，是共产主义者有着心智上的束縛。这个问题值得更深刻地加以研究。

在我同我国自由主义的报纸《下午报》的一位編輯最近进行的一次討論中，他对我抱怨說：“共产主义者一般的行为就像他們剛剛和上帝开过会一样”，这就說明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的人被共产主义者弄得惶惶不安，不願意看到他們在身边。我回答說，由我們看来，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是这种想法：自从他們在几个世代前接到最后的使命以来，从上帝那里竟还有什么話傳过来。这就用美国風行的“俏皮話”表述了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之間的哲学論爭。馬克思主义者相信真理是可以察知的，而当真理被發現以后，即应努力将其傳播，傳播得越广越好；自由主义者相信，对每一个問題有两个到一打的同样正确的答案；我們所能办到的，最多也不过是不受特殊利益的影响，从中作出選擇，用抽籤的办法从可能的答案中去挑定一种，也能同用任何其他办法一样，达到同样高度的成功。自由主义者否定了权威主义的单一教条，但却代之以相反的教条，即多数答案具有同等的可靠性。他們以为他們的心胸是自由的，因为他們在对人类各种問題的众多的答案之上任意翱翔，不受任何指导；他們可以自由地追随当时的任何一种非非之想。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純粹的幻想，因为它只是偶然地才能对生活的现实問題提供解决办法，失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同科学的方法截然相反的。

馬克思主义对美国生活必須作出的最高貢獻，就是把科学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用从旧的和已知的东西中得出新的和未知的东西的科学理論方法，去代替盲目的碰碰試試的方法。这就是对运动中的世界的理解，对运动規律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得有可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預測，以便使人类心灵不再面对一系列經常出現的意外，自己毫无准备。

美国公共生活中喜剧式的特点之一，就是报纸竭力把共产主义者描繪为永远是被事件的每一个轉折和剧变弄得惊惶失措的人，被每一件新事情弄得困窘不安的人。这种煞費苦心制造出来的口实，是用来掩盖制造这种口实的人自己的而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惊惶失措和困窘不安的，只有通过对共产主义者的真实立場同样煞費苦心制造出来的歪曲，才能維持这种口实。在美国，除了在共产主义者自己所办的刊物中，关于他們对任何重大問題的意見实际上不可能得到一点概念。所有其他的東西，报纸，杂志，书籍，演讲，无线电等等，虽然时常地詳細地談論共产主义者，却总是煞費苦心地掩藏和歪曲共产主义者自己想要說的話。

关于这一点，我在1942年刊行的《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受到的待遇提供了一个最有趣的例证。实际上沒有一個人企图去在报刊中分析和批判那本书的論点。在这方面所作的少数假托的东西（《美国經濟評論》，1943年9月；《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紀事》，1944年3月），也是使用那种老办法，即假定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写的——除了为苏联辯护之外，就不会有別的东西，于是，除了在这方面可能加以歪曲的东西以外，对于书中其他一切一概忽視。凡是談到承认苏联是世界上的主要因素的地方，一概拿来证明：共产主义者“对俄国的将

来的关切”，使得他們反对或看不见美国的利益。只要应用一下这个公式，就算最后地处理了我們的观点。

我已經能够預言，对本书的几乎所有一切評論的內容将是怎样。本书的明显的特点，是迫切要求美国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并說明如何在实际上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但是这个特点一定会被完全掩盖在这个公式之下：白劳德贊美“德黑兰”，因为斯大林曾經出席；他拒絕贊美“魁北克”，因为斯大林沒有出席；要說明的是，白劳德只不过是斯大林的替身，因此对于他說的話，絲毫不必注意。涉及到我們自己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时，美国公众討論就是墮落到了这种地步。

当这种方法支配着公众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时，不論对什么问题都不能有任何健全的輿論。这并不是主張共产主义者永远是对的，或者甚至說他們在任何一件具体事情上都是对的的问题。問題是在于，看待共产主义者所用的方法是这样，以致它曲解了全国思想的整体，歪曲了美国公共生活的整个过程。

不妨假想一下——可怕的想法——共产主义者也可能在一个重要之点上碰巧是正确的！即使根据那种理論說共产主义者通常是錯誤的，应当与之进行最頑强的斗争，但这依然是可能的：他們也許有一次是正确的。但按照美国通行的态度，这样做是損害很大的，因为它意味着，这样一来，在这一点上整个国家就会自动地被排除在采取正确的立場之外。除非能改变这种情况，否則共产党人对他們国家的福利能够作出贡献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永远小心翼翼地采取錯誤的立場，希望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自由地采取正确的立場，如果偶然有別人能够将它提出的話！这是在美国理智生活中一个充分发展了的理論，以“死的接吻”得名并受到尊敬。即使是一件最有价值的事业，一

且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赞成和拥护，它就接受了“死的接吻”，变成了被詛咒的东西！一个新聞界微不足道的人，弗雷德里克·伍耳特曼，向美国一些最有势力的男人和女人发出了公开的命令——而他们就跳起来去服从他，其敏捷的程度是他們对待美国总统的命令从来不会表现的！

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們本身的存在，就对美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为这揭露出存在着上面所說的能够摧毁美国的、理智方面的毒气。如果馬克思主义者不存在，那末国家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須創造他們。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在一万个其他的公民中，将由于其存在而确实地揭露出来：社会所受不讲理性和蒙昧主义两种崇拜——希特勒主义的根源——的危害达到何种程度，因为只要一經馬克思主义者接触，它便全部激动起来，变成恶毒的明显的行动。如果没有馬克思主义者存在，这种毒气便只是靜悄悄地和无影无踪地进行它的毒害工作，等到发觉它，为时已晚了。

当美国人一旦学会了理性地而不是歇斯底里地对待馬克思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者，当考虑他們的观点时只看这些观点的价值如何，然后接受或拒絕，像对待所有其他公民的观点一样，不問其来源为何——这在我国和世界的进步上的确将要是一个用紅字印上的紀念日。

在現在的情况下，即是只談到“紅字日”〔“red letter day”〕也是危险的，因为“紅”字〔“red”〕就已經够陷人于罪，而“日”字〔“day”〕則是馬丁·戴斯和他的国会委员会所要調查的。

如果有任何人怀疑我是这幅諷刺怪画的作者，就让我来請他們去參閱美国文官委员会关于如何找到顛复分子以便将其开除公职的条例；在那里，他們可以看到，“高度的爱国心”〔“an

advanced degree of patriotism”]就足以使一个人招致怀疑。看来似乎只有馬克思主义者才从“爭取生存的战争”中有系統地得出一切邏輯的結論，因此，任何其他的人如果也这样作，那对他們是危險的。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相像，在中国，被怀疑为共产党因而有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險的学生，只要不务課业，閑逛妓院，就足以祛除对他的怀疑，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使他們在中国的“联邦調查局”的眼中立刻洗刷清白，证明他們是安分和穩健的可敬公民了。

美国馬克思主义者所担負的是一項艰巨的任务：教育他們的国家，使之理解：共产主义者也是人，很像他們的所有同胞們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新的思想方法。

不管这个任务何等困难，它是必須完成的，因为——这比在国内政策問題上更严重更直接——如果美国一听到“共产主义者”就变得歇斯底里的話，那它就将发现自己完全不能解决它的对外政策問題。共产主义者是现今世界图画中无可逃避的一部分，如果美国要在这个世界上起到重大的作用，我們將要看到，必須全国学会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不面紅耳赤、尖声怪叫、两脚踩地板、晕厥、或表現其他无理性的恐惧。要开始学习这一課，沒有比就在国内更好的地方了，这里有着我們自己的本国种的共产主义者。

在清明地、客观地对待本国和国外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美国將要逐漸地、艰苦地开始消除其全部关于什么是馬克思主义的錯誤教导；我們將要懂得，这样一幅图画：怒目而視，感情用事，爰走极端，意識錯乱，破坏成性，嗜杀，不容異見，以教条主义式的暴动从事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而不顾国家利益，毫无爱国之心——这幅图画是經過一世代的高压的、多方說服的宣傳而

深深鑄入他們的腦海的——是偽造的，是和真理截然相反的。

他們將看到，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是非常從容鎮定和神志清明的。他們不是感情用事的，而是富有理性的。他們不是愛走極端的，而是現實主義的。他們不是意識錯亂的，他們學會了如何在地震和風暴中保持自己的均衡。他們不是破壞成性的，他們學會了如何在混亂中從事建設。他們不是嗜殺的，他們的全部哲學和實踐是人類兄弟友愛的表現。他們不是不容異見的和教條主義的，他們已把忍耐提升為一種高度的藝術，把靈活性提到了原則的水平上。他們從來沒有玩弄過革命這個概念，把它當成是某種有趣的冒險或客廳中的遊戲；他們對政策的全部考慮永遠是絕對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除此之外，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套思維體系，這種體系對全世界所有各族人民的問題放射出一種新的和更為深刻的智慧之光，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怎樣思考，只要他們試圖正直地思考，就都可以分享這種明光。

在這個使每個國家經受考驗的世界危機時期，美國的最大需要是學會如何正直地和迅速地思考。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政治思維繼續放在神話和偏見的基础之上，或者如果我們學習現代世界的現實過於緩慢，以致趕不上歷史前進的步伐，那就沒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們所認識的美國從長期的災難中挽救出來。

如果我們能夠毫不畏縮地面對現實，並依現代的條件恢復杰斐遜、潘恩和林肯的偉大傳統，那麼美國就可以團結起來面對世界，在“德黑蘭”所提出的拯救人類的集體事業中擔負一個主導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德黑蘭”向我們指出了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我們必須學會如何沿着這條道路，不偏不倚，走向它的光輝的目的地。